



獨立閱讀

China Individual Reading Report

荒诞破碎现实中的诗意

读托克维尔，不忘卡尔·马克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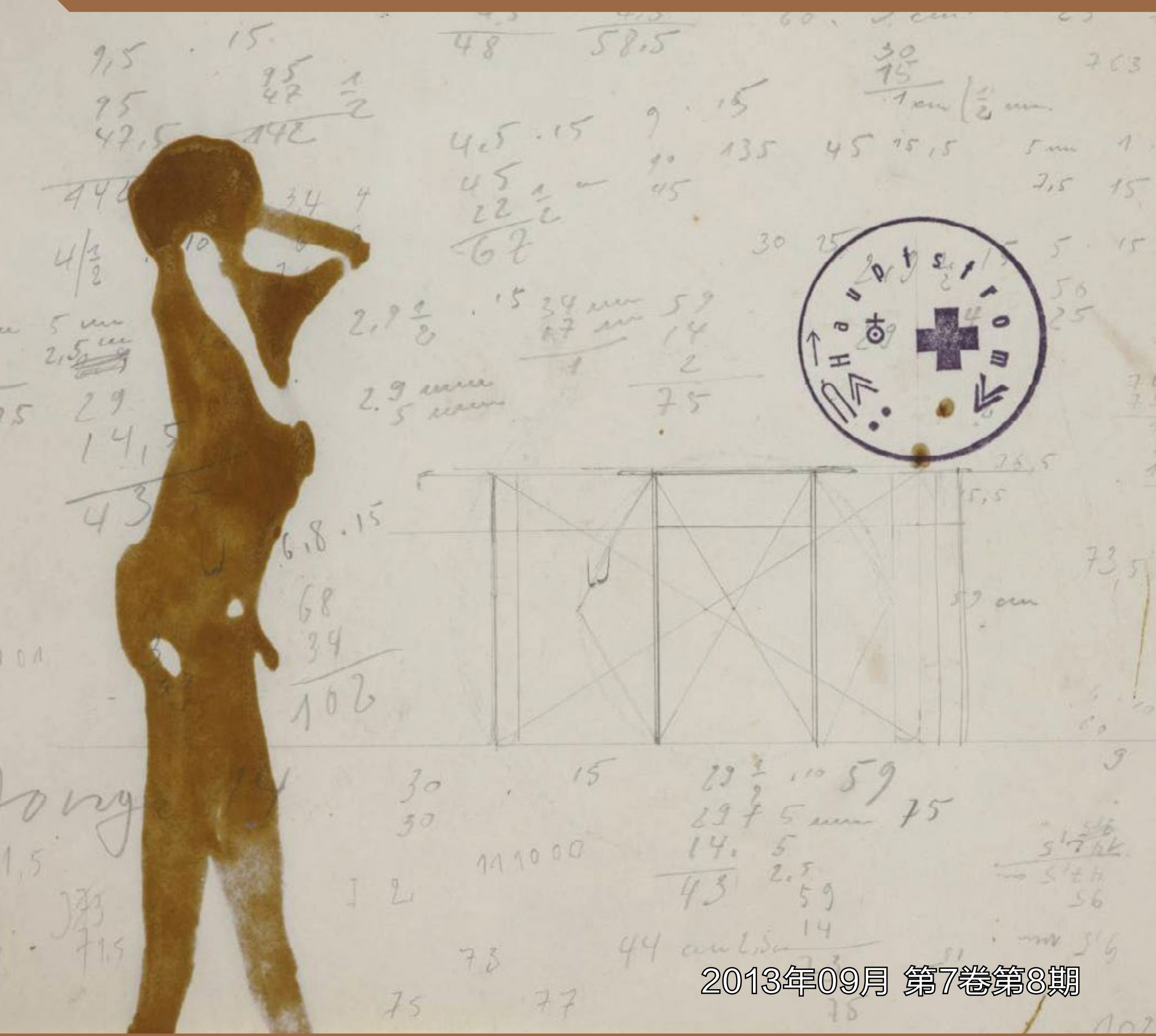
寂静的阿卡迪亚

靖国神社问题“发酵”的前前后后

禅修的“本来面目”

一再重复的青春

陈平：
最后一个共产主义者的离去





獨立閱讀

China Individual Reading Report

執行編輯

苏小和 王晓渔 成 庆 言 一
夏佑至 扬 克 孙骁骥 灵 子

轮值编辑

王晓渔

观察员

经济：苏小和（北京）

思想：成 庆（上海）

文史：王晓渔（上海）

特约撰稿人

戴新伟（广州）	刘 柠（北京）
夏佑至（上海）	马慧元（加拿大·温哥华）
凌 越（广州）	孙骁骥（北京）
贾 葭（香港）	罗四鸽（美国·波士顿）
孙传钊（上海）	扬 克（德国·图宾根）
灵 子（北京）	吴 强（北京）
言 一（成都）	朱 白（广州）
朱航满（石家庄）	

翻译 朱芳艺（美国·孟菲斯）

设计 刘承周（北京）

2013年09月 第7卷第8期

总第68期

致力于 公民社会的常识阅读

细则

○ 阅读报告力求独立但不宣称中立，撰写过程谢绝图书作者、出版者、发行者介入，观点尊重个人趣味，不求客观统一。

○ 独立阅读执行编辑谢绝出版机构赠书，赠书将自动排除出推荐行列。师友赠书将注明图书来源，对于相关部分，读者可以抱十倍怀疑之态度。

○ 独立阅读欢迎读者提出不同意见，将选登部分批评类读者来信，但谢绝只有观点没有论证过程的批评。

○ 独立阅读观察员欢迎申请加入，但谢绝出版从业人员参与，来信烦请告知专长领域并附上阅读报告一份，连续三期撰写阅读报告将列入观察员名单，连续三期没有撰写视为自动退出；一年内在“独立阅读”发表三篇及以上文章者列入特约撰稿人名单，否则视为自动退出。

○ 独立阅读欢迎订阅，凡订阅者将成为独立阅读的定向发行对象，在第一时间与独立阅读观察员、特约撰稿人共享阅读成果，读者来信、作者申请以及订阅事宜，烦请发信至shrbooks@gmail.com。

更多即时信息：<http://www.douban.com/group/duliyuedu/>

2013年以前各期“独立阅读”均可在以下地址下载：

<http://iask.sina.com.cn/u/1682295802/ish?uid=1682295802>

2013年各期精排版“独立阅读”均可在多看阅读免费下载：

www.duokan.com

“独立阅读”的微博地址为：<http://weibo.com/1819737225>

欢迎各位关注。



作为长期的“拖延症”患者，“独立阅读”这次不出意外地又拖延了。但需要向诸位读者报告的是，浙江大学出版社的“独立阅读·天下”丛书和安徽教育出版社的“独立阅读”书系第二辑已经出版，前者包括罗四鸩的《波士顿情书》和孙骁骥的《不列颠笔记》，后者包括孙传钊的《东张西望》、夏佑至的《干掉摄影师》、朱航满的《书与画像》和灵子的《忧郁的常识》。

“独立阅读·天下”丛书有一枚书签，印上了顾炎武的一段名言，这里把它送给诸位读者：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目录

封面用图

The Table 1952
Joseph Beuys



阅读报告
中国大陆

005-012

文 学 • 朱航满
戴新伟
经 济 • 苏小和
文 史 • 王晓渔
摄 影 • 夏佑至

书评

• 朱 白
荒诞破碎现实中的诗意

• 孙传钊
读托克维尔, 不忘卡尔·马克思

• 罗四鸽
寂静的阿卡迪亚

022-035

随笔

• 刘 柠
靖国神社问题“发酵”的前前后后

• 成 庆
禅修的“本来面目”

• 朱 白
一再重复的青春

036-047

逝者

• 吴 强
陈平：
最后一个共产主义者的离去

048-052

特约撰稿人 朱航满（北京, zhm7976@126.com）

读完方方的小说《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十月》2013年2期），几乎整夜失眠，心里也难过。方方笔下涂自强，几乎有着每一位从乡村挣扎出来农村青年的身影，或多或少。当然，也包括我自己。涂自强是一个缩影，方方的书写，让身上本已经麻木的那种暗伤与忧愁乃至恐惧，似乎又瞬间被洞穿乃至是放大，甚至还提供了一张清醒重申和冷静反观当下自我生活的镜子。这故事无疑是一个浓墨重彩的悲剧叙事，正如方方给主人公的命名一样，“涂”与“徒”的谐音，“自强”终究将是一场徒劳。那种笃信“天道酬勤”以及“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等种种励志信条的乡村青年，涂自强的人生奋斗悲剧，几乎便是提供了一种让人无法接受的绝望回答。

内心巨大悲伤，显然也来自作家巧妙的叙事处理。小说的前半部分几乎都在一种近乎美好的氛围中推进，涂自强考上大学，成为乡村青年的成功典范，然后备受关爱和令人羡慕的进城之路，再然后是大学象牙塔中的读书学习，作家将这个农村孩子塑造得朴实、单纯、勤劳、孝顺、上进，因此，他的失败与毁灭就让人倍感痛惜。打破这种美好来自于他缴纳学费时的异样眼光，而悲伤的氛围则来自于和他一起在食堂打工女孩的独自离去，那种小说前部的美好已经逐渐在被破坏。到了大学毕业前夕，父亲的突然去世、考

研深造梦想的破灭以及找寻工作的无奈，涂自强开始面临的悲苦事件一个接一个。先是工作后老板的欺骗逃跑，同班同学的不同人生，再是母亲的伤病进城，直到最后他的身患绝症，正如方方在小说中所写到的那样，这是一个还没有开始人生的悲剧。

曾几何时，我们向往美好的生活，试图按照诸如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中的励志故事，激励自己在这个世界寻找安身之处，然而，现实却告诉我们，那更多的只是一个美好的童话罢了。你用真诚去面对这个世界，而它却往往以其残酷和冷硬来回应你。作为乡村青年，涂自强的命运，有些《人生》中高加林的



影子，仿佛画了一个圆圈，从起点又回到了起点。不过，涂自强的命运，相比高加林，则更为悲惨。的确，诸如涂自强这样的人物，也有其致命的缺点，他仿佛是一个自我封闭的小宇宙，有着自己的思维方式和处世原则，对于外界缺乏灵活的接纳乃至反击，往往只是被动地接受，这无疑来自于他从小接受的思维束缚和教育局限的结果。由此想来，也没有理由对他有太多的要求。

倒是令人略感欣慰的是，涂自强的失败，最终是身体与梦想的失败，而不是肉体与灵魂的堕落和衰败。即使在最艰难的困境之中，他依然保持了人性的完整。这或许是作家方方的一种理想坚守，同时也增添了小说的批判性与力量感。因此，这种单向度的人格化写作处理，也蕴含了强烈的愤怒情绪。涂自强无疑是千千万万个向上挣扎的乡村青年的典型缩影。方方在小说的题目中强调，这只是涂自强的“个人悲伤”，而在结尾处，却写道了一个作为同学的他者情思：“他想起这个一直在闷头努力的同学。他从未松懈，却也从未得到。他想，果然就只是你的个人悲伤么？”

陈应松的中篇小说《去往菰村的经历》（《上海文学》2013年1期），让我想到了卡夫卡的小说《城堡》。在陈应松的笔下，中国的乡村充斥着一种光怪陆离的荒诞色彩，他想要去的地方被称之为“菰村”，其所在的县城则为“荒泽县”，而接待作为主人公“陈主席”的则叫“丁四卯”，更为离奇的则是陈主



席在荒泽县的经历，要么是奇怪的吃喝，要么是荒诞的参观，要么是古怪的行程，要么是令人悲苦发笑的乡村事件。这所有被描述的一切，都令人感到一种仿佛是患病者难以自察的混沌与无奈，甚至还有共同想法设法来隐藏疾患的事实真相。作家无疑是作为一个外来者和旁观者的角度来审视中国乡村的一个典型，并由一段段让人发笑又不无荒诞的小故事串联而成。

其实，这些故事原本也是我们乡村中的“正常事件”。但是作为具有现代文明代表的省作协主席这一角色的审视和旁观，这一切便显得分外的荒诞和具有讽刺意味；而作者也有意带着嘲讽的口吻描述乡村里所发生的种种的离奇故事。由此，中国的乡村变成了一个形式主义充斥、官本位思想浓厚乃至不作为的腐败温床。如果说中国的问题是乡村

的问题，而乡村的问题则首先是与其直接联系的基层政府机构的问题。作家笔下的“菰村”，便成了一个“独特”的乡村个案，因为这个乡村即将开始一场基层民主选举。小说便从陈主席想方设法去菰村了解选举真相，和被千方百计地被阻止去了解选举的经历展开，最终主人公陈主席也没有去成，而是被强制性地“押送”回省城。“一路大雨滂沱”，这是主人公陈主席对返城环境描述，简洁而寓意深刻。

如果说陈应松的这篇小说写得是乡村，但准确地说，其实还不是乡村，而是作为乡村基层政府机构的众生相。面对上级部门和领导，他们刻意地讨好，也想法设法地制造和谐与兴盛的假象，为此不惜动用各种方法和途径；而面对乡村的村民和更为低级的机构，则又显示出强权与冷酷的面孔，甚至不惜采用非正常地手段来维护乡村秩序的稳定和繁华的假象。菰村选举乃至最终其失败的结果，便是这一政府手段的典型结局。陈应松与其说是塑造了当下农村凋敝和惨淡的景象，不如说这篇小说更准确也少见地塑造了当下中国乡村基层权力机构在夹缝中维持现状的种种荒诞与可悲。显然，这是一出精彩的讽刺情景剧。在权力垂直的中国社会，最底层的官员如此艰难，也如此可悲，那么作为他们的子民们，究竟该是怎样的一种生活状态呢？

《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作家》，2013年5月）读了两遍，应该说是三遍。

十年前，我在《书城》杂志上读到这篇小说的第一个版本，印象就很深刻。但直到对这次发表修订版的两次重读，才发觉对于这篇小说，其叙事的重心并不在于我之前关心的怀特大夫的形象颠覆之上，那个曾经被我们不断颂扬的加拿大医生。“天堂”，应该是薛忆沩这个短篇小说重点探讨的一个概念，他甚至不惜将这个小说写成一个复杂精致的文本。

在薛忆沩的这篇小说中，怀特大夫和他的同行弗兰西丝医生以及布朗医生曾多次探讨过关于“天堂”这个概念，答案或者是爱，或者是童年，或者是上帝。而不曾参与的这次讨论的部队领队，对于“天堂”的理解，则又有着更为准确和现实的答案。小说的叙事，在第一层面上就是按照这个领队的理解，带领他们一起躲避战火、渡过黄河，然后奔赴到革命机关所在的“天堂”，这一艰难过程形成了小说的基本叙事结构。另一个层面，则是精神世界的维度，也就是怀特大夫的心灵独白。虽说是他写给前妻的书信，但无疑是他对于内心追寻梦想的回忆、思索、质疑和重建，也直到他写给前妻的这封无法寄达的书信时，这个曾带有几分波西米亚式浪漫革命气息的怀特医生，才发现他的所谓“天堂”，并不是远在天边，而是能够和爱人一起“亲近”。在作家十年前的小说中，这个词语是“接近”。显然，十年后修订的文本，正如卡尔维诺所讲到的，它是“精确”的。

当然，必须要谈到第三个层面，那就是

死亡。这也正是他们同行中的布朗医生所谈到的所谓上帝的天堂，而我们也都知道，怀特医生的原型，最终是死在救治病人后感染的这个结果。因此，在第三个维度上，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其实也就是通往死亡的最后那一段旅程。为此，我们不得不提到作家薛忆沍写到的怀特同行的弗兰西丝的死。从信件开篇的那一句人物死亡的论述开始，怀特医生五次用同一种话语来强调这种死亡：“傍晚的时候，弗兰西丝在一次心不在焉的空袭中丧生了。”在小说中，这句话出现了相同的四次，每次都会略增加一些描述，然后继续讲述。这个叙事的技巧一方面增添了对怀特医生悲伤情绪的营造，更重要的是将弗兰西丝为革命死亡的结局平添了残酷与荒诞的气息。正如在第五次叙述中，弗兰西丝的死亡过程被详细描述，让人惊心动魄，而其死亡的原因，则是“在一次心不在焉的空袭中丧生了”，且“只有两架日军的飞机参与了这一次空袭。它们好像是在返航的途中偶然遇见了我们的队伍的。”

关于这篇小说，最后，我们还得返回“天堂”这个概念。作家为怀特医生的心灵独白设置了父亲的遭遇，父亲因为曾经作为随军翻译而有机会保留了这封书信。父亲和他的领队都得以在其所理想的“天堂”工作，但后者却在一九六八年在一次批斗会上死去，父亲本人也最终被判处十年徒刑。曾经向往的“天堂”，竟是如此。更为令人惊叹的是，作家在最后写到了父亲对于“天堂”的新认识：“这十年的囚禁生活是我父亲的‘天堂’，因为他从此就完全‘觉醒’了。这觉醒使他获得了内心的宁静与自由。”由此，作家薛忆沍才最终完成了对于“天堂”的第四个层面的阐释。还尚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对于欧美小说技巧娴熟的作家，这种对于一位加拿大支援中国抗战医生的内心描述，也是一种试图以欧式语言来讲述故事，由此产生的一种特殊的“间离”效果。而结尾处父亲对于“天堂”的真正理解，又似乎回到了费正清有关中国人在启蒙觉醒上的“冲击—反应”模式，因此，这篇小说的思维方式也应是西方化的。Q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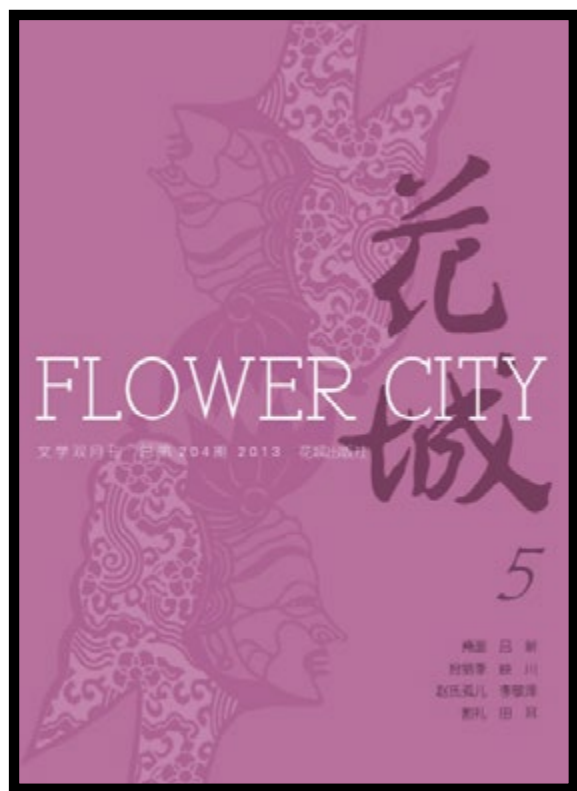
特约撰稿人 戴新伟（广州，pessoal935@163.com）

文学期刊的读者和编者，某种程度上怀有一致的使命，即挖掘作者。在读田耳的小说之前，这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只零星地听到过有人提及，但他肯定是近期值得注意的一个作者，《花城》5月号上的短篇、《收获》4、5月号上的长篇足以证明。尤其是读过之后。

先说短篇小说《割礼》。这是一个常见的题材：混了大半辈子的县城文学中年，与他遇上的计划生育故事。前者是叙述者“我”，后者是昔日的文学同道，笔名劬夫——因其主业是个骗猪匠，但他比“我”更痴迷于文学，按照“我”的话说，比“我”更具有文学天赋。小说的重心落在另外一件事上：计划生育，结扎。“我”是下乡做这项工作的政府工作人员，劬夫夫妇是被服务的一方。文学经历与现实冲突将这几人扯在了一起。

对文学圈的掌故式写法，尤其是对那些痴迷于文学创作的人物进行或神话或嘲讽的组装，一直不鲜见。《割礼》当然有点自嘲，

“我”与长期女网友的关系，来往邮件都看得出，这是曾经痴迷于文学创作而现在什么都不是什么都没有了的小人物。甚至他自己都清楚。然而，作者并没有特意放大这种失落，既没有怨天尤人，也不见玩世不恭——这种非常常见的一种油滑的小说语言并不存在于《割礼》中，这部短篇让人读到的是十分干净、节制的语言。



长篇小说《天体悬浮》分别在今年第4、5期《收获》上连载，讲述的同样是底层故事，人物、场景更为阔大。叙述者丁一腾、主人翁符启明，两个二十多岁的年轻小伙子，都是洛井派出所的辅警，故事从符启明在另外派出所犯了事，来到洛井派出所开始。从这两个小人物的身上，展现一个派出所的工作生态，进而展现一个城市的生态。在派出所的工作内容中，黄、赌、毒的抓捕故事固然给人真实感，但更真实的是，这些地下产业何以成为了产业，成为了一些人的事业和希望，又是如何紧紧地将每个人的心思都系于一处。在今天，社会新闻比小说精彩相信是不少

人的共识，但田耳的这部小说可以解答这个疑问，即新闻负担的是什么内容，而小说又将负担什么责任。尽力去呈现我们社会中的某些形态只是部分真相，真正的揭示出时代的秘密才是文学的能力。

这便是主人翁符启明的故事。《天体悬浮》不是成长史，而是奋斗史。符启明虽然只是辅警——在派出所的级别中属于倒数第三，排在巡逻员炊事员之前，但他天分高，人极聪明，而且情商高。如果有所谓人生秘密的话，那么他便是打小就掌握了整个人生秘密的人，所以也无所谓成长。他是那种放在哪里都会发光的人，所以在洛井派出所很快就赢得了领导的信任，赢得了友情，赢得了威望，更重要的是在业务和经济上都充分显示了他的灵活。他是十足的行动派，无论在哪一方都如鱼得水，“搞懂了”，也就成了我们常见的“吃得开”式人物。于是越滚越大，辅警的身份也没有局限他，终于成为了本地的风云人物，成功人士。

贯穿在小说中的观察星空（天体），始于符启明和丁一腾的女友，小末和沈颂芬，继而这两个男的也有了兴趣。这一恋爱时的爱好，对丁一腾而言只是恋情终结后的纪念，而在符启明那里，却可以做成天体爱好者俱乐部，还可以发展成为以此为掩护的地下黄色产业。符启明依然热爱观察天体，同时也脚踏实地，不仅打着天体的旗号做生意，而且进军地下赌场，还热衷于收购凶宅，成为本地著名的凶宅收购人。



在小说的下半部，当符启明已经成为人所共知的杰出青年之后，在其地下产业也经营得如火如荼之时，作为旁观者、也是符启明最好的朋友的丁一腾是这样的观感：

“符启明就是这种胸有大局的人，甚至，晚上看星星的时候，偶尔觉得某些星星摆得不是位置，他都很想将它们调一调，让布局更为合理，让星空更加灿烂。”

无疑这也是类似于符启明这样人物的写照：孜孜不倦地向上，向上，向上，孜孜不倦地得到，得到，得到，孜孜不倦地做大，做大，做大。他们并不有意为之，而几乎是天性如此。他们是生活的强者，是时代的佼佼者，在他们的身上，完全体现了社会的准则和价值观。他们从不争论，而总是擅长低调做事，掌握一切机会，赚取财富，而一旦亮相，也是经过深思熟虑，背后埋下若干伏笔。简单来说，

这是成功者的故事，他们无所不能。

就像跟新闻比真实一样，小说如果要为成功者画像，无异于沦落为可笑的“报告文学”。《天体悬浮》可以看到时代的某些病症，但并不仅仅于此。值得注意的是，在主人翁符启明之外，丁一腾的戏份不少，它并不只是叙述者，或者一个陪衬。相比之下，他是平淡的，并未得到太多的财富与好处，占据的不是社会所谓的一流中的地位，但他是难得的对成功持有平淡心态的一个人。在很多事情上，丁一腾不是符启明的附庸，反而像是作为一个怀疑、反对的角色存在的。这个人物，和符启明更像是一个人的两面：成功与平凡的内心挣扎，折射出在时代里扑腾的人的多面性。

如果说这部小说有缺憾，很显然，符启明的结局未免太突兀、太牵强了（此处不剧透）。虽然时代的弄潮儿往往结局都让人大跌眼镜，但这部小说的结尾与前面的布局相比，真是太过仓促了。在“香港女神”夏新漪被害一节，侦破情节的安排实在有助于整部小说的节奏，属于精彩的部分，但从技术性上而言，却显得不够充分，有些薄弱。像他的短篇一样，《天体悬浮》的语言依旧很赞，看看对话便知道，自然熨帖。像这样的题材，在某些小说家那里，可能就是官场黑暗叙述。我还记得一个细节，当丁一腾觉得符启明背叛自己、被伤害之后，他说话时喉结哽了一下，对长篇小说而言，这样的炼字炼句是非常精心的照顾了。📖

观察员 苏小和（北京, susumartin@hotmail.com）

科斯去世了, 哀悼。

科斯著作中, 已经翻译过来的中文著作, 或者介绍、研究科斯经济学的著作, 我手头上比较有价值的, 有以下条目:

1、《企业的性质: 起源演变和发展》 (姚海鑫、邢源源译, 商务印书馆, 2007年2月)。

这是一本论文集, 收录了科斯于1937年首次公开发表的经典论文《企业的性质》, 以及科斯在1987年为纪念《企业的性质》发表50周年而举行的一次研讨会上所做的三篇演讲, 还有科斯在获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时所做的演讲。因此这是一本专业性质的关于企业性质的科斯著作, 编者因此用“起源演变和发展”来界定本书的内容。从这四篇文章中, 人们能看到科斯关于企业的学术思想的形成、演变及其发展过程。毫无疑问, 这是试图理解科斯定理最为关键的一本书。

2、《企业、市场与法律》(盛洪、陈郁译, 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年6月)。

这本书最大的价值, 是收录了科斯另外一篇伟大的论文《社会成本问题》, 一共有科斯的七篇论文, 包括《企业的性质》、《边际成本的论争》和《社会成本问题》, 其余几篇或拓展、或说明、或解释了上述三篇文章的观点。



3、《变革中国: 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 (徐尧、李哲民译, 中信出版社, 2013年1月)。

主要由科斯的助理王宁所做, 有一种经济分析史的味道, 不具有文献意义。

4、《科斯经济学: 法与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斯蒂文·G. 米德玛著, 罗君丽等译, 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年12月)。

这是一本试图系统解释科斯经济学的著作, 并非科斯原著。研究者沿着十一个方面向人们解释了科斯。第一, 交易成本、生产成本和岁月流逝; 第二, 科斯主义的混乱: 企

业的性质和历史特性问题；第三，关于企业的三大难题；第四，对话科斯的成本：一个旨在调和对科斯定理的证明和反证的综述；第五，科斯定理和有关侵权行为，合同边界的难题；第六，再论产权、交易成本和科斯；第七，再探法律现实主义：法律—经济学—组织视角；第八，科斯的经济政策分析：框架和含义；第九，科斯的学术成功之道；第十，科斯、共产主义和苏维埃模式经济的“黑箱”研究；第十一，科斯、英国传统和经济学方法的未来等。

理所当然，我们有必要关心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围绕科斯定理产生的学术纷争，或者学术应用。

一种最具有中国问题意识的怀疑是，一批哈耶克的门徒们认为，科斯或许到最后都没有看清楚中国的非市场经济体制的隐蔽性，这可能是科斯在学术路径层面过于依赖成本分析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经济学家莫志宏的观点就显得十分醒目且尖锐，分析中国经济问题，尤其是经济制度问题，还是哈耶克的范式来得准确。正是有鉴于此，目前国内一批哈耶克的门徒如冯兴元、毛寿龙、王建勋、莫志宏、刘业进、秋风、黄春兴、干学平、高全喜等学者，正在系统翻译哈耶克的著作。

汪丁丁对科斯的解读，可能是中国经济学家中最能够与国际经济学界接轨的观点了。他不太赞同将科斯的交易成本当成一个空前独立的经济学分析范式，而是主张将交

易成本纳入到机会成本的范畴。张五常先生或许也是这样的意思，他提醒中国读者，应该关注合约背后的约束条件。据说张五常去见科斯，两人谈起科斯的的文章，科斯问，你认为我的那篇文章说了一些什么？五常老先生果断地说，是在说合约的局限条件。据说科斯当时很兴奋，他说，到底还是有人明白我。

尽管如此，莫志宏、张五常或者汪丁丁对科斯的解读，因为缺少现学现卖的中国趣味，不可能引起大众的关注。人家更加关心，科斯对企业成本和社会成本的双向分析，到底能够在多大的程度上解释中国的经济。这才是最具有效用性的科斯定理中国视角。这方面最有深度的经济学家，是周其仁。

周先生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

最早触动中国经济学家的科斯经济学，重点并不是怎样通过企业组织来节约市场交易费用，而是怎样发展市场经济来节约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超级公司那极其高昂的组织成本。

仔细辨析周先生的这段话，能够看到两个关键词，第一是企业交易成本，第二是国家组织成本。

企业交易成本，当然很好的解释了企业的市场行为。1937年，科斯发表《企业的本质》，讨论了企业存在的原因及其发展的边界问题，由此，科斯创造了“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s）这一重要的范畴来予

以解释。所谓交易成本，即“利用价格机制的费用”或“利用市场的交换手段进行交易的费用”，包括提供价格的费用、讨价还价的费用、订立和执行合同的费用等。科斯认为，当市场交易成本高于企业内部的管理协调成本时，企业便产生了，企业的存在正是为了节约市场交易费用，即用费用较低的企业内交易代替费用较高的市场交易；当市场交易的边际成本等于企业内部的管理协调的边际成本时，就是企业规模扩张的边界。

这样聪明的经济学构想，让人类的经济事务在企业和市场关系的命题上豁然开朗，作为一种科学的经济学由此朝前迈进了一大步，这正是科斯得以在多年以后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大奖的理由所在。不过对于中国人而言，人们最关心的问题，“却不是市场的交易费用太高，而是笼罩整个国民经济的中央计划命令体制的组织成本太高”。

这依然是周其仁先生的判断。周先生提出这样的建设性观点，是基于科斯的另外一篇论文，1960年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科斯从对庇古关于“外部性”问题的补偿原则，也就是政府对市场的干预问题入手，开始研究市场交易的外部性问题，他的观点是，只要交易成本为零，那么无论产权归谁，都可以通过市场自由交易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这是经济学体系里最为著名的五大不相关理论之一，科斯定理由此成为经济学理论最重要的范式之一，198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勒将科斯的这一思想概括为“在完

全竞争条件下，私人成本等于社会成本”，并命名为“科斯定理”。由此，科斯被认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鼻祖。

相关的问题意识在这里出现。如果一名中国学者对科斯的《企业的性质》和《社会成本问题》这两篇伟大的论文足够理解，如果这名中国学者同时又对中国的经济史和社会发展史有足够了解，他会理所当然地写出哀歌，尤其是在科斯先生去世的时候。

我说的依然是周其仁先生：

邓小平的出发点是另外一极，即囊括了整个国民经济的超级国家公司。在这里，国家用“看得见之手”的权威和计划协调整个国民经济，固然因为消灭了一切市场交易而不再受到狭义“交易费用”的局限。但是，科斯定义的另一种成本即“组织成本(organiza-



tioncost)”，却每日每时困扰着这个超级国家公司。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出发点就是降低超级国家公司的巨额组织成本。为此，他提倡分权改革战略，通过对重新界定权利的合法认定，激发了个人、家庭、基层组织和地方的积极性，还同时把企业家协调和价格机制协调一并请回到中国经济的舞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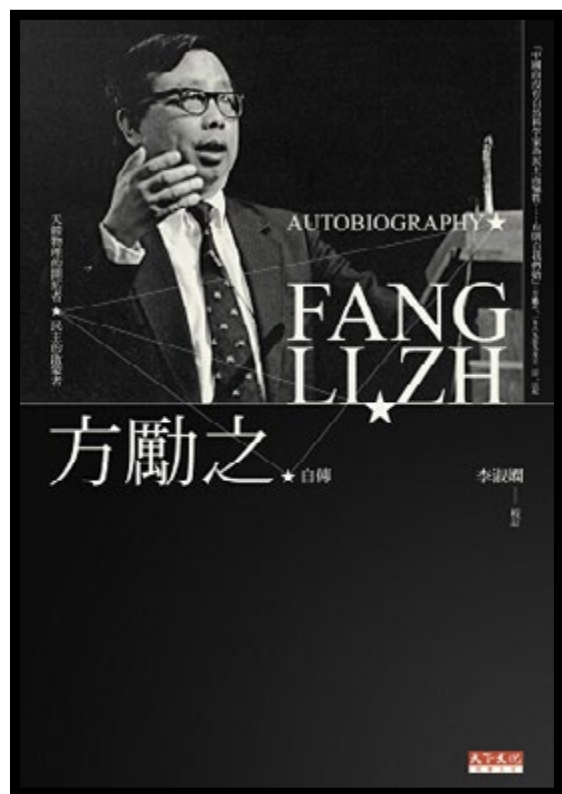
在我看来，这是一首写给中国历史和中国当下的经济学哀歌。超级的国家公司在漠视企业交易费用的同时，带给中国人的社会成本实在是太高了，这不仅是一种当下的批判，也是一种历史的陈述。不仅是一种历史性总结，也是一种当下改革理念的提出。可以肯定地说，中国社会和中国经济之所以必须强调改革，科斯的理论范式已经为我们解释了最深刻的原因。正是如此，吴敬琏先生才说，“科斯学说是中国改革的明灯”。



观察员 王晓渔（上海，wangxiaoyul978@sina.com）

“我所看到的每一项自由的进步都是学生和教师奋力争取得来的，而不是中国当局自上而下赐予的。”针对傅高义先生在《邓小平改变中国》（即《邓小平时代》，三联书店，2013年1月）中对传主过度的“同情之理解”，方励之先生这样评论。作为1980年代中国校园民主的重要见证者，方励之的评论更有说服力。在《方励之自传》（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4月）里，他回顾自己刚任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时，学生问他“想把科大办成什么样的大学”，他的回答是“大学应当成为思想中心”。随后，他与校长管惟炎先生致力于把科技大学推动成思想中心，严格区分党政，取消学生政治辅导员制度，取消对学术报告会的政治审查……俱往矣！

这几年，中国内地出版了许多台湾作者的书籍，却缺失一个很重要的领域，即对转型时期社会运动的介绍。郑鸿生先生的《青春之歌》（三联书店，2013年8月）弥补了这个遗憾，虽然仅仅这一本依然是不够的。作者系当年台湾大学哲学系学生，参与并见证了“保钓运动”、“台大哲学系事件”等事件。台湾社会运动的精神资源和内地有着很大的不同，简单而言，台湾常是以左反右，内地则是以右反左，两岸却又有殊途同归之处。“保钓运动”是台湾社会运动的重要节点，与内地“宁可大陆不长草，也要收复钓鱼岛”的保钓不同，郑鸿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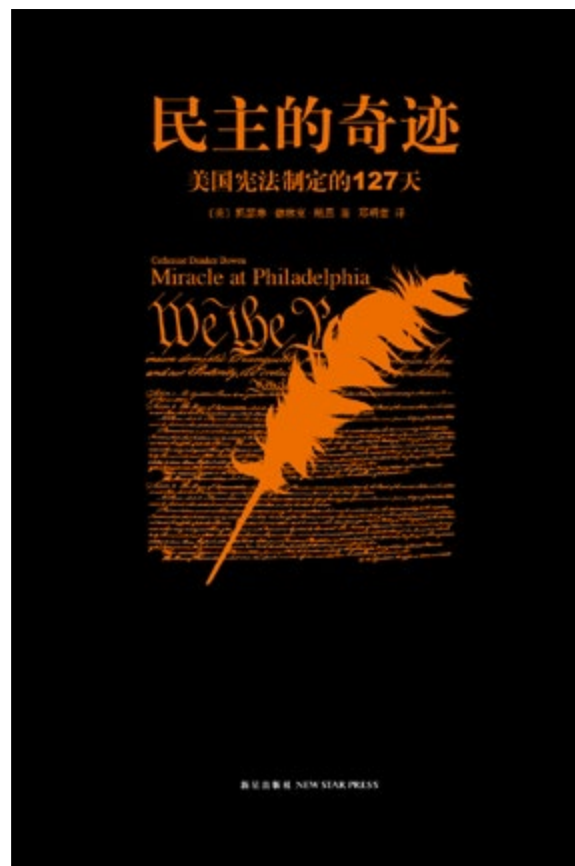
指出，自己及同伴“不是追求富国强兵的民族主义者，反而更敏感于国家机器的压迫性”，这倒是与内地对“保钓”持批评意见的人士有共通之处。

这些不远的历史已恍如隔世，更恍如隔世的是教会大学。岱峻先生在《风过华西坝》（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年5月）里钩沉了这么一段被遗忘的往事：抗战期间，华西协和大学接纳了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齐鲁大学、燕京大学，五所教会大学在成都华西坝弦歌不辍。今天回顾抗战时期的大学教育，最常被提及的是西南联大。西南联大的价值毋庸置疑，但是对五所教会大学的忽略，说明了重

国立轻私立的偏见依然根深蒂固。虽然在读钱穆《师友杂忆》时，我曾留意到他和顾颉刚在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的经历，但读到《风过华西坝》，才知道当年坝上的学术盛况，仅燕京大学就有陈寅恪、萧公权、吴宓、李方桂等学者。

俄国学者米尔斯基的《俄国文学史》（刘文飞译，人民出版社，2013年1月）没有引起应有的关注，“这是用包括俄语在内的所有语言写就的最好一部俄国文学史”，我看到封底上的这段话才注意到这本书。这段文字颇具腰封党特色，本可忽略不计，但出自纳博科夫，就需要认真对待了。纳博科夫一向眼界奇高，谈起文坛人物遇佛杀佛，能如此评价一本文学史，殊为不易。这部《俄国文学史》写于1920年代，至今仍被牛津大学和耶鲁大学使用，这也促发刘文飞先生翻译此书。让我有些不解的是，作者十月革命后离开俄罗斯，对苏俄政权有着明晰的判断，为何后来却逐渐左倾，30年代飞蛾投火式的返回苏俄，最终死于集中营。

《民主的奇迹》（鲍恩著，郑明萱译，新星出版社，2013年6月）和《叛逆者》（拉塞尔著，杜然译，山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9月）是两本关于美国的书。《民主的奇迹》主要讲述制宪会议的故事，关于政治制度的琐碎讨论在作者的笔下变得生动起来。出现分歧并不可怕，充分呈现分歧并进行争论是达成共识的前提。与对美国先贤众口一词的称赞不同，《叛逆者》主要在于呈现人性之恶，同时讲



述“恶”是如何参与塑造自由制度的。这是对“素质论”的最好反驳，国民素质低下因此不适合民主，这种说法不仅为无限推迟制度建设寻找理由，而且思想改造以“提高国民素质”为名畅通无阻。承认人性之恶，所以制度才是必要的。但需要补充的是，这不等于人性只能是恶的，也不意味着公民意识的养成是不重要的。Q

特约撰稿人 夏佑至（上海，2005wangwei@gmail.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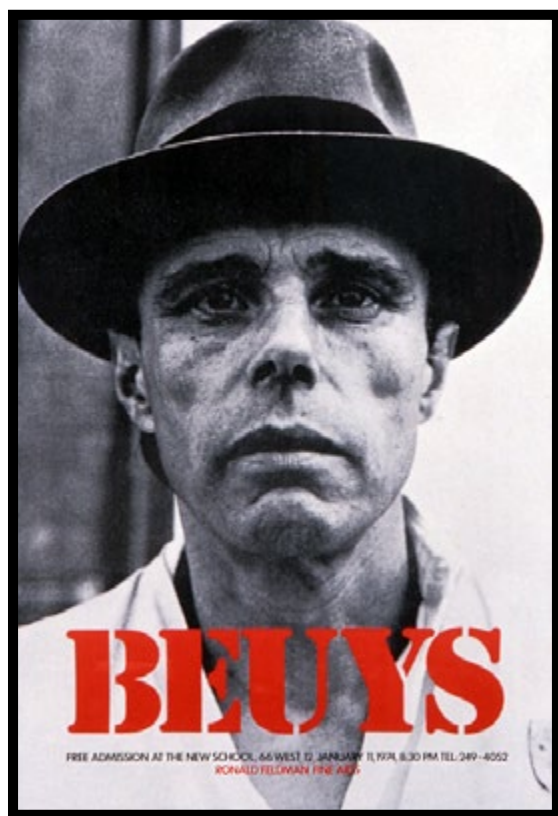
几乎所有政治主张都无法回避这个问题：掌权之后怎么办？只有无政府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旨在消解这个问题。在中文语境里，无政府主义和其他非正统而又以“主义”为名的事物一样，天然散发着某种边缘和模糊的危险气息。这种气息显然不是来自现实的威胁，而是思想上的不安。后者又是一连串误读的产物。中国人对无政府的恐惧根深蒂固，正如有人把随地吐痰也称为无政府主义：这类误读一方面出自传统，另一方面，也是缺少不带偏见的政治学研究和教育使然。

实际上，无政府主义的政治光谱如此宽泛，以至于古典自由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都与之有部分重合。这让人在总结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根本特色时，不免颇费踌躇。几年前我曾和吴强兄谈及这个话题，他认为，无政府主义最大的价值在于使人对权力的替代性幻想免疫。这真是当头棒喝。当时我正困惑于身边五年一次、类似周期性癔症的社会气氛。尽管民间俗语对这种气氛也不无刻画——比如“皇帝不急太监急”，但大抵属于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毕竟不能像社会科学那样，给出如此有穿透力的断语。

无政府主义虽然不是当今政治的主流，但其实践形式，经演化成各种社会运动的形式，潜伏在制度化政治的表皮底下，偶尔还会浮出水面，如1960年代末席卷欧美的学生

运动。这场学生运动在文化上的影响不用多说，西方艺术的所有方面几乎都因此改头换面，即便是政治、商业和科技领域，也普遍渗入——反过来可以说是收买——了学生运动的态度和行为模式。

在此可举三个人为例，其中两个人是混血。白人和阿拉伯人的混血儿，后来成了商品拜物教的新教主，而非洲黑人和白人的混血儿成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总统。乔布斯和奥巴马的出生时间在学生运动发生之前，乔布斯的母亲是威斯康辛大学的研究生，奥巴马的母亲是夏威夷大学的本科生。跨种族恋情和未婚先孕使她们承受巨大的社会压力，但她们坚



持生下了孩子。从无政府主义的政治观念中演化出嬉皮士文化，持续了两代人，甚至更久。乔布斯和奥巴马上大学的时候，学生运动的高潮已经过去了，但他们的行为举止仍然带有嬉皮士的风味，只是叛逆的成分较少，时髦的成分居多。这种轻度的无政府主义品味很容易与主流社会达成默契。相比之下，约瑟夫·博伊斯的经历和观念更复杂，其无政府主义活动看上去也“有害”得多。

约瑟夫·博伊斯生于1921年，年龄上应算是乔布斯和奥巴马的父辈。他曾加入纳粹青年团，二战中参加德军空军，任领航员，并在克里米亚地区遭苏军击落。伤愈后，他并没有退役，而是加入了更加危险的空降兵部队。战前的博伊斯，仅是个业余的博物学家和带有浪漫情调的人类学爱好者，他后来那些晦涩但相当激进的观念，显然更多是来自战争中的经历。他在战后过着旋风般的生活，无论是艺术还是政治主张，都表现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基本取向：民主、自治、反对现行政治体制，在某种程度上反对资本主义生产和生活方式。

1951年，博伊斯进入艺术学院学习，后留校任教。1967年，他成立了德国学生党，这成为他1971年被大学开除的导火索。1970年代，博伊斯以知名艺术家的身份，参与创办了德国绿党并出任发言人。绿党——这个色彩鲜明的名称正是博伊斯命名的，但他后来因政见不合被该党解除职务，排除在联邦议员选举的候选人名单之外。朋友和党内同志们纷纷说



他的政治理念不切实际。1986年，博伊斯死于荷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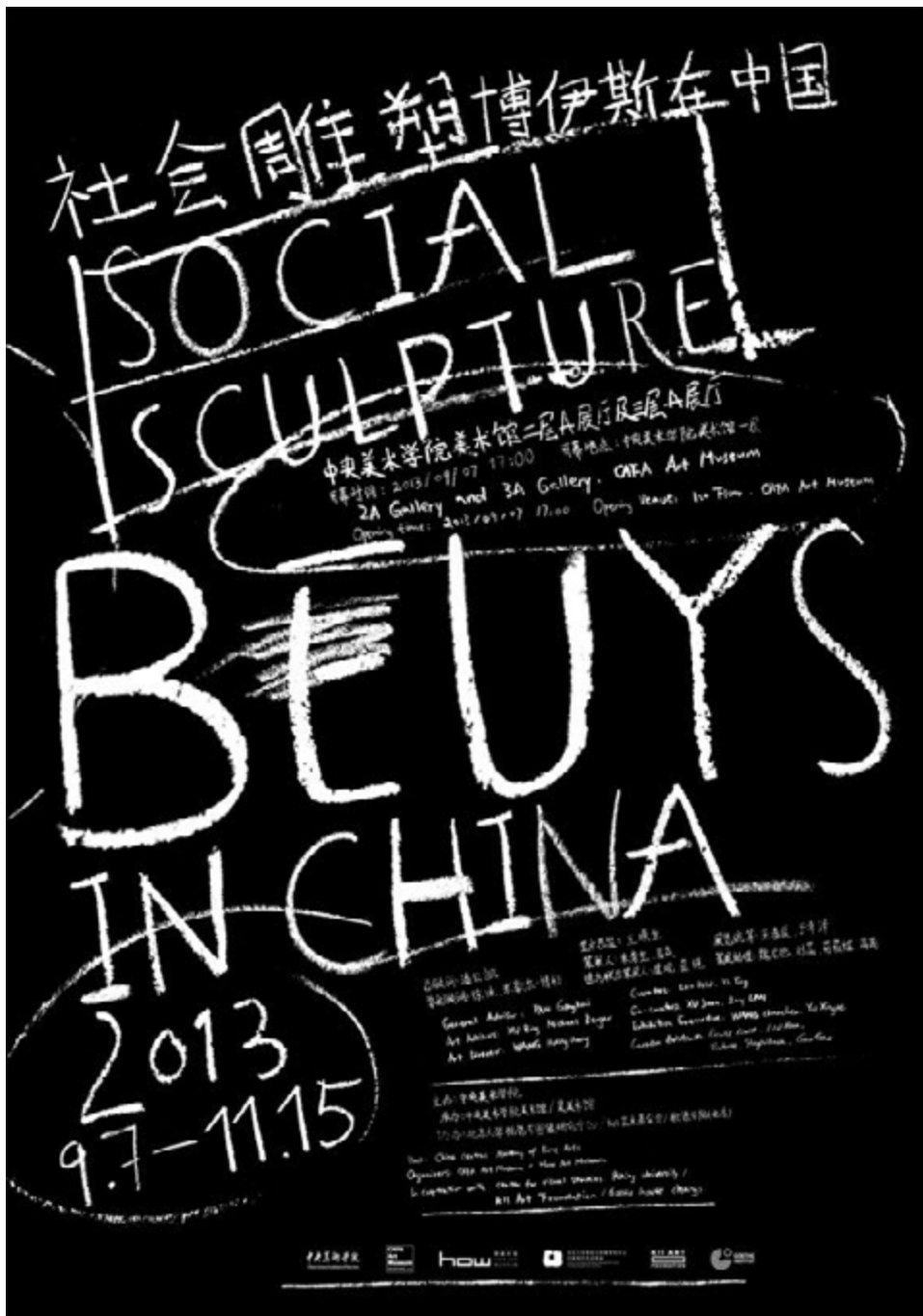
用文字翻译博伊斯的艺术实践是件危险的事情，因为他的作品带有随机性。博伊斯的部分作品据说已经被中国藏家收藏，藏品正在中央美院美术馆展出。展品中包括大量现成品（详细信息可见编年体的展览图录《社会雕塑：博伊斯在中国》，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2013年）。博伊斯在照片、酒瓶、海报和商标上写字、签名，就像马塞尔·杜尚在小便器上签名——如果不把它们和当时的社会观念和博

伊斯的政治行为联系起来，这些作品就毫无价值。

去中央美院美术馆参观的路上，我和朋友经过一处门脸不大的单位，门口白色牌子上写着“花家地派出所”几个黑色宋体字。不知道为什么，这个门牌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以至于在整个参观过程中，心中都横亘着一种挥之不去的异样感。所谓如鲠在喉，大概正是如此。中央美院的展厅宽敞明亮，展品丰富，布展也很专业，展厅门口还有一个高级食品的推广台，一个漂亮的姑娘穿着蓝色低胸长裙，歪着头在那里玩手机——如果不是花家地派出所那块小小的、白底黑字、毫无个性的单位门牌，博伊斯这个人、他的作品、政治观念连同这个展览，在我的经验中也许会更妥帖，如今却显得颇为古怪，甚至有点滑稽。

展览名为“社会雕塑：博伊斯在中国”。但如果没有那种如鲠在喉的感觉，恐怕很难理解“博伊斯在中国”的社会性何在。因为经济和其他方面的原因，越来越多的当代艺术品来到中国办展。在北京或上海某个明亮宽敞的展厅里，策展人或多或少地致力于把作品从它们的政治和社会语境中抽离出来。最好的办法当然是为展品贴上艺术史的标签，以凸显其学术性。但艺术史怎样才能消化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呢？实在是一个让人胃疼的问题。

消化不良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学术体制的麻烦还在于对应该收集整理的东西视而不见。



1948年，爱好摄影的张祖道毕业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旋即参军南下，直至1952转入北京《新观察》杂志社，任摄影记者。《新观察》的刊名显然有沿袭储安平在上海办的《观察》杂志之意，创刊在党和知识分子的蜜月时期，由著名女记者戈扬主编。多位《观察》的老作者也为《新观察》供稿，其中最活跃的应属社会学家费孝通和潘光旦。1952年的院系调整之后，社会学专业已经不复存在，



费孝通和潘光旦也离开了清华大学，参与组建中央民族学院，但在反右运动开始之前，他们的工作至少看上去仍与专业有关。费孝通先后赴内蒙和家乡江苏吴江县开弦弓村做调查，潘光旦则前往湖北、四川、贵州等地，进行民族识别。其时，他们均跻身中央政府委员会委员之列，所谓调查，更多是高干下基层的性质，而非以人类学者的身份从事田野调查。张祖道以学生兼摄影记者的身份随行，为老师的文章配图。

费孝通和潘光旦的文章先后发表，影响颇佳，但在1958年的早春天气里，费孝通的《重返江村》还没有连载完，反右运动的钟声已经敲响。随着潘费二人打成右派，张祖道的照片也失去了发表的机会。尽管社会学在1980年代开始重建，但在30年的中断期里，学术潮流发生了几次重要的转向，几乎使这门学科不可能在中国得到充分的发展。张祖道尽心保管着底片。它们如今兼具历史纪实和视觉民族志的双重价值，却遭到历史学和人类学界的双重漠视，长久以来无人问津。出版的努力直到照片拍摄50年后才得到回应。《江村纪实》（锦绣文章出版社，2007年）和《1956：潘光旦调查行脚》（锦绣文章出版社，2008年）是在一套摄影丛书——“纸上纪录片”丛书——中出版的，尽管这与丛书中其他作品的内容和风格格格不入，但出版本身毕竟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

“纸上纪录片”保存了一些极为有趣的视觉记录，尽管作品之间的风格并不协调。关于这套书，留到下次专门说一说。Q

荒诞破碎现实中的诗意



特约撰稿人 朱白（广州，youjinma@gmail.com）

1979年查尔斯·布考斯基首次买了辆新车，这对于头戴“地下诗人桂冠”、整日鬼混于廉价酒吧的老男人来说，相当于物质生活的翻天覆地。两年后，根据布考斯基小说集《常态的疯狂》（Tales of Ordinary Madness）改编的意大利电影上演，导演马可·费拉里大概更钟情于个人风格，所以将这部相当写实的小小说拍得非常写意。这里要说的是，上世纪80年代，在经历跟出版商签约、被拍摄纪录片、受邀写电影剧本、结识明星朋友、受邀朗诵、将文稿卖出、获得艺术资助金、欧洲旅行等等一系列跟写作没多少关系的“好事”之后，布考斯基过上了基本衣食无忧且名声节节高升的日子。金钱、名誉，此时他都有了那么一点。

而这部作为首次正式引进翻译出版的布考斯基小说《苦水音乐》（Hot Water Music），出版于1983年，接近查尔斯·布考斯基生命的最后十年，也是他的创作高峰和相对来说日子比较舒服的阶段。所谓日子

舒服，就是花甲之年的布考斯基不用再像以往那样，每天从肮脏中起身，然后去过着体力劳动的一天，接着喝醉，找个同样肮脏的女人过夜……这种生活几乎伴随着布考斯基大半生，今天看来多少有点寒酸和破败，但这只是我们作为旁观者的想法，当事人不见得有什么不安，甚至只有如此他才感到舒服也说不定。

在根据布考斯基自传体小说《苍蝇酒吧》（Barfly，又译夜夜买醉的男人，1987）改编的同名电影中，你能看到米基·洛克扮演的一个走路斜晃佝偻着身子的男人，他在酒吧跟男人对打，跟搭讪同样醉醺醺的女人，把自己喝个烂醉，然后还要打字前写那些同样摇摇晃晃的诗歌……米基·洛克的脸过于俊俏了，以至于在这部电影里，你会看到一个令人心碎的男人形象，他用酒精和肉欲糟蹋着自己的同时，也让人看清了这个糟粕咸湿的世界本身。

布考斯基说：“戒酒的酒鬼与重生的基

“信徒是最糟糕的……”（《苦水音乐》中的《破商品》）这不是揭示某种生活真相，跟价值观的输出也没啥关系，而是以一种放纵和极端的姿态让读者迅速进入布氏语境。

“你以为两个人生活在一起能彼此扶持。才没有，他们会落入互相指责的循环。他批评她，他指责她。他们两个都是输家。现在他们只是等着看谁比谁更尖酸刻薄。”

（同上）这不是针对情感类的心灵鸡汤，只是他眼中的一点真实生活而已。布考斯基一生看似放荡不羁、跟不同的女人睡觉，有过跟女人的同居、婚姻生活，但其实经历的女人数量并非人们眼中的那么不羁，他更不是那种朝三暮四水性杨花的薄情之人。

在布考斯基的生平大事中显示，他第一次跟女人上床是“23岁时被一个300磅的婊子破处”；1947年，他27岁，跟简·库尼·贝克相识，并一起生活8年（这段生活比较奇怪，据美国的FBI文件显示，两人结过婚，但布考斯基对此从未承认过）；1955年与芭芭拉·弗莱结婚，弗莱在写作上帮过布考斯基，两人曾一同编辑过名为“丑角”

（harlequin）的书，直到三年后离婚；离婚后的布考斯基又重新跟简·库尼·贝克和好，1961年，布考斯基曾经有过一次自杀未遂，次年简·库尼·贝克去世；1963年结识弗朗西斯·史密斯（也有一种说法两人1960年就相识了，这也是《邮差》后半部分里的“费伊”原型），次年他们的女儿莫瑞娜·路易斯·布考斯基出生（布考斯基在小说中称她为“小丫头”），布考斯基曾经在听到史密斯怀孕的消息时，像传统的男人一样提议结婚，但史密斯当时拒绝了，此后布考斯基终



《苦水音乐》
查尔斯·布考斯基 [美] 著
巫土、杨敬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年8月

生在经济上支持母女，并在情感上从未与母女分开，到了晚年，布考斯基唯一愿意听从的人就是他的这个女儿，莫瑞娜曾还说服并教会布考斯基使用电脑写作，她以她的父亲自豪；在1965年与史密斯分手后，他先后结识过琳达·金、丽莎·威廉斯等人，也就是1969年这个阶段，布考斯基的创作日渐顺畅，不但与文学经纪人约翰·马丁签约，还拿到过奖金，各种版本的改编作品也接连上演和问世，此时他全职写作，且基本生活已经不成问题；1976年，在一次朗诵会上，布考斯基结识了后来的妻子琳达·李·贝格，此时的布考斯基已经买新车、写剧本、被拍成电影，所谓功成名就的日子终于来了，当然，物质生活不是人生的全部，比如在不用为下一瓶酒发愁的时候，布考斯基迎来了肉体上

的病症，1980年代末，布考斯基接受过几次手术，还因为肺结核治疗被迫戒酒；一直到1994年去世，布考斯基一直在写作。

就此，这不是什么夜夜笙歌颠鸾倒凤的人生，而是一个简单的活过来的一生，你不能单纯看到哪一段时期这个人接触了几个女人，就张口称之为浪荡或性开放，究其细节的每一片段人生都是事出有因进而情感丰沛，即便有些什么召之即来的艳遇，也没有有什么不伤筋动骨的欲望发泄，尽管布考斯基的小说里喜欢这么写，但你知道，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往往没有那么决绝。

前文提到的布考斯基与文学经纪人约翰·马丁的交往，也值得一说。从失魂落魄的酒鬼作家，到在相对舒适的环境下可以坐下来安心讲讲文学的事儿，这种具体生活境遇的改变，源于当时的一个办公用品经销商约翰·马丁。

马丁是个文学迷，也有着收集文学作品的嗜好。当他在一种类似地下出版物中读到布考斯基的文学作品时，据说有一种如今可以被形容成醍醐灌顶之类的感觉，“犹如电影聚焦，其他人都退到了背景之中”。就此，马丁决定成为布考斯基的出版商，且专门为他成立了一家出版公司。合约中值得一提的是，马丁支付布考斯基每月100美元的终身生活支持，这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是不错的数字，是按照当时布考斯基月收入四分之一来计算的。布考斯基从此可以辞掉邮局的工作专心写作。

如果说有今天我们阅读布考斯基，甚至通过阅读布考斯基打开另一个精神世界这种事情，必须要感谢约翰·马丁这种人，是

文学出版家、文学经纪人、文学代理人，以及真正有眼光、见识以及独立审美能力的出版编辑，才有布考斯基这种作家流传和留下。

而对于作家来说，从自己撰写作品到形成一部产品的过程中需要一位“帮手”，他们可以让你的作品通过书的形式与读者见面——而与读者见面，当然是作家写作的一种目的所在。

不妨回头看看我们当下的状况，文学期刊和书店里经营的文学作品，大多是所谓主流价值体系里的产品，缺乏多元和繁复审美的可选择性。不仅仅铺天盖地的诸如诺奖获得者莫言、已畅销很多年的贾平凹、余华、韩寒、郭敬明这种当仁不让的主流产品，而且也看不出任何不同审美下的可选择余地。或许电商那里也可以说明一点，大多数号称有阅读习惯的人，将在网上买一本《看见》当成了唯一的阅读兴趣，再或者是成功学和心灵鸡汤。即便落实到文学阅读，销售榜上的韩寒、冯唐等也永远占据着前排位置。

真正的悲剧不是前排位置的当红作家，而是我们几乎没有所谓的后排和小众读者喜好的分类，那些永远不入流、永远进入不了专家视野的作品无处生存。文学期刊的编辑、文学出版的图书编辑，几乎在制度的限制和审美的障碍双重挟持下，放弃了对文学多元化和小众文学的努力。不一定人人都利欲熏心，但的确是大家普遍被名利蒙住了眼睛。

包括各大文学奖项，围绕着名家打转，围绕着明星作家即便签下不平等条约也在

所不惜，围绕着有畅销潜质的作家苦心包装……就是没有人再愿意为小众服务、为可能还是莫名其妙的文学价值贡献眼光、为新人给予扶持的力量。对于文学现象他们手握发言权但却发出了吱吱杂音，没有见地，更没有发现和挖掘的勇气和才华。一个劲儿地往钱眼里钻，市场反响是唯一命门，罩住了就鸡犬升天，失去了就全家老小跟着数落你这个loser，这太凄惨了……可是这样的凄惨究竟有什么必要出现和存在下去呢？我们为什么非要以一个所谓的成功人士节奏来要求自己呢？

所以，跳出僵化的体制和商业的势利因素，独立出版社正如一种必然之物在产生和发展，相对小众和另类的审美，眼下只有独立出版可以做到不被名气和市场销量蒙蔽双眼。

如果说我们要在小说的语言中领会一位作家的能量，那么这样随意戳破生活伪装的“告知”大概可以满足你。虽然不是很重要，但很多人一直在遮掩和隐瞒的，在布考斯基看来，正是需要给你提个醒的东西。

我曾经揶揄过国内出版人没有眼光，一直看不上布考斯基的作品，尽管在台湾繁体字版问世的数年之后也打动不了我们狭隘和势利的出版商，但现在，说实话，我对自己那近似乎顽童胡闹式的抱怨感到后悔，看看这部短篇小说集《苦水音乐》里的《好一个阿姨》、《不算是伯纳黛特》、《两个吃软饭的》、《比蝗虫还不雅观》、《被烧到就要尖叫》、《人渣的悲伤》、《进去，出来，结束》、《爱电梯的男人》、《你吻了莉莉》、



《好一场宿醉》、《这是个肮脏的世界》，等等，哪怕是其中一篇的几段话，你也会惊讶出版商的魄力和眼光——毫无疑问，这是一部在中国目前写作集体呈凌空蹈虚和弱不禁风之时最值得被引进的作品，这也是一部同时考验出版者眼光和勇气的艺术品。

尽管《你读过皮兰德娄》在国内出版《苦水音乐》时，被因为某种角度的考虑而被拿掉了，我还是要为出版者的审美和见识唱唱赞歌。顺便说一句，这篇小说是我读过最幽默的一篇，几乎可以相当于冯内古特的长篇小说《时震》，尽管它篇幅很短，但完全将一个男人所能实现的幽默达到了极致。无与伦比，配得上这四个通常只能自大的人才说得出的字。我跟朋友介绍布考斯基这部小说多么精彩时，甚至不由自主地完全复述

了这个故事，它太精妙了，而且是那种不经意间就能让人昏倒的精妙。不知道出版社会不会在将来将之在网上发表，正如《肠子》出版时那样——《你读过皮兰德娄》不是噱头，而是文学的精彩之处。

当然，布考斯基有他的噱头，但本意不是让你看到之后仅仅尖叫两声，而是给你一个角度，可以真切地观察到这个世界很多不为人知的真相。在布考斯基面前没有小人和虚伪，以及造作的经不起掂量的情趣，他让很多面目不清的人就此现了原形，即生活非你想象的那般美好，它甚至有时连掩饰都不够严密，慌慌张张和破碎是其永恒的本质。那种荒诞的、破碎的细节，甚至也是我们所说的诗意一种。

比如有多少文学作品中，当主人公来到一个酒吧随即就会出现一个火辣美女，不是主动献媚就是被其搭讪成功，色香诱人，一切都成了顺理成章地美好——可胡子拉碴常常宿醉的布考斯基漫不经心地告诉你——哦，充满肉感的女人放了一个屁，她还说这是“送你一个吻”。这是基于一种趣味和具有割肉般痛感的描写。我知道很多中国作家肯定不服气，他们能写得更美，甚至更有洞察力，而很多读者也会谄媚地表达出自己喜欢的也正是那种虚泡泡空洞洞式的写法，但在我看来，布考斯基的是真正的逼近生活原貌，他直接将自己最敏感的触角深深地插入了生活本身，这没什么好说的。

有人说最近布考斯基的话题多了，因为两本正式出版的小说，在媒体和评论家看来这是一个相当于雷蒙德·卡佛式的美国作家——贫瘠、底层，更重要的是不为人知

的卓越。尽管在“卡佛”以及他的那些句式成为流行金句后，我已经不再喜欢这位作家（这虽然跟这作家本人关系不大，但还有他死后妻子编辑的几部选集，也确实透露着卡佛不成熟和被世人盲目追捧的灾难性问题），但还是很希望看到布考斯基能够被更多的人熟悉。很多人慕名买了布考斯基的书，开始喜欢，并且承认那种迷人从简单字词中就可以流露出来。

说到布考斯基的迷人之处不能不提及他的叛逆精神，布考斯基的叛逆不仅仅是一种精神，也非一种类似疾病的心理环境，而是一种跟血肉和痛疼有关的自身。在《苦水音乐》这部短篇小说集中，有两篇小说《父亲之死 I、II》，将一种近似弑父的情结宣泄个淋漓尽致。但与文学史上或者文艺电影中的传统形象不一致的是，布考斯基笔下人物并非沉默、忧郁的那类。如果说俄狄浦斯弑父娶母尚需神谕和哲学意义上的终极思考驱动才能完成的话，那么布考斯基笔下的人物则在一瓶酒之后再来一瓶酒，就可以完全无视刚刚入土为安的父亲了。而这种无视感接下来的意思便是，儿子可以跟父亲生前的女朋友调情，然后“你看起来真像他”使女朋友无法拒绝儿子的邀请，甚至她自己已经迫不及待地需要将儿子替换成那个刚刚死去的父亲。

障碍消失了，从传统中的悖论、煎熬和永久的困惑中，布考斯基让他的人物跳跃到儿子可以睡自己父亲的女朋友的现实处境中。媾和，而非迎娶；父亲的女朋友，而非生母，看上去失去伦理之后的人物关系顺理成章地被划定在极其容易简单的范畴之内。

前文提到布考斯基从文学经纪人和出版商约翰·马丁那得到一份合同，拿到了固定收入辞掉邮局的差事，而在这之后1970年他创作完成了首部小说的名字正是《邮差》，此前布考斯基的创作以诗歌和“short story”（故事，近似短篇小说）为主。据说布考斯基写就《邮差》仅用了四周时间，作为小说家的首部小说一般都是长期酝酿和压抑的结果，单纯地从“四周”来看好像是充满了快捷、方便、速食之类的标签，但从阅读质感上来说，这显然是一个经得起揣摩和回味的长篇小说。

《邮差》的故事基本还是他所经历的一段生活，在布考斯基的生活经历中有一个重要的女人简·库尼·贝克，大他十岁，在《邮差》中她叫“贝蒂”，他们经历的同居生活中包含了谩骂、争吵、动手、垂危、葬礼，这是平凡而又动荡的生活一种。布考斯基与简·库尼·贝克在洛杉矶于1947年相识，经历了断断续续的十几年相处，直到贝克1962年去世，两人感情相当深厚。如果非要在布考斯基生命寻找一个对其影响最大的女人，那么简·库尼·贝克应当是不二人选。在后来布考斯基的诗歌中，也有不少是专门写给贝克的追念情诗。

正如跟贝克的生活，布考斯基的这份邮局工作也经历了几次进进出出、断断续续，但这毕竟是他这一生中第一个、也是唯一一

个正式长期的工作。

因为与约翰·马丁签约，并拿了其支付的报酬，布考斯基开始动笔写自己的第一部小说。如果单从布考斯基签约前的创作来看，他都是些短篇小说和诗歌，那些当然不如中长篇小说更容易形成商品，所以约翰·马丁对布考斯基说“如果你能写小说就好了”（泛指中长篇小说）。四周之后布考斯基电话通知约翰·马丁来取小说，后者惊讶速度太快，是怎么做到的。对此有记载布考斯基的回答是“恐惧”。

我这样理解“恐惧”，除了生活压力，其实更是一种“靠谱”，怀揣对金钱、对善意、对信任的惴惴不安进而将创作完成。所以，布考斯基不是那种不讲原则的混蛋。无论是对待非婚所生女儿的亲情，还是合作伙伴的友情。

布考斯基对生命尤其是自己的生命态度，在他的小说中昭然若揭，包含着随遇而安和随他去吧的心态，以及极致时的放弃的念头。这种对生命的有意“忽略”也正是他获取自在生活方式的源泉之一。1961年，41岁的布考斯基曾试图通过煤气自杀，这反映了他的态度，但随后的事更加反映他的价值观——自杀途中，煤气令其昏睡之后又醒来，然后因为头痛，他打开了窗户。自杀宣告失败，而失败的理由又是如此顺其自然。❶

读托克维尔，不忘卡尔·马克思

——傅勒的《马克思与法国革命》读后



特约撰稿人 孙传钊（上海，sunchuanzhao@hotmail.com）

1859年托克维尔去世后，至二战结束，将近百年间，没有完全为人遗忘。19世纪70年代阿尔贝尔·索雷尔（Albert Sorel）还把他作为“转型期”的思想家，给与很高评价。1893年托克维尔的三大著作之一《回忆录》出版，他的名字重新引起著述界的注意。之后，托克维尔德著作不断重版。复活托克维尔贡献最大的是旅居英国的德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J.P.梅耶（Joacob Peter Mayer）。1939年他策划了出版《托克维尔全集》。因此，二战后托克维尔能很快成为具有现实意义研究、争论的思想家。进入20世纪50年代，托克维尔及其思想在美国成为热点，在冷战时代，西方各国学术界把他作为自由、民主的旗手。美国学术界因为《美国的民主主义》（即《论美国的民主》——编者注）上卷，把他看作赞赏以高度成长为目的的现代自由主义经济体系的思想家；在法国，雷蒙·阿隆把他称作：“19世纪的孟德斯鸠”，是与苏联为首的社会主

义体制相对抗的理论资源。但是，进入1970年代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制自身，也显露出各种矛盾。《美国的民主主义》第二卷中关于资本主义各种病理的分析开始引人注目。思想史研究领域，诸如约翰·波考科（John Greville Agard Pocock）、汉娜·阿伦特乃至尤尔根·哈贝马斯等人的共和主义思想流行，托克维尔及其著作也成了这一派的理论源头得以复兴，引起人们重新考察、比较美国和法国两大革命之历史长短、得失。于是美国的社群主义者们也屡屡要追溯到托克维尔，法国也流行起一个“新托克维尔”的学术热点，特别是2005年纪念托克维尔诞生200周年前后。最近30年美国学术界注意力转向他的政治自由主义论。其中以罗杰·博谢（Roger Boesche）的研究成果影响力最大，在美国成了学界的主导（据说博谢政治思想对奥巴马影响很大），这种倾向逐渐传入法国。冷战结束后人们发现冷战期间，哈耶克等人过分强调经济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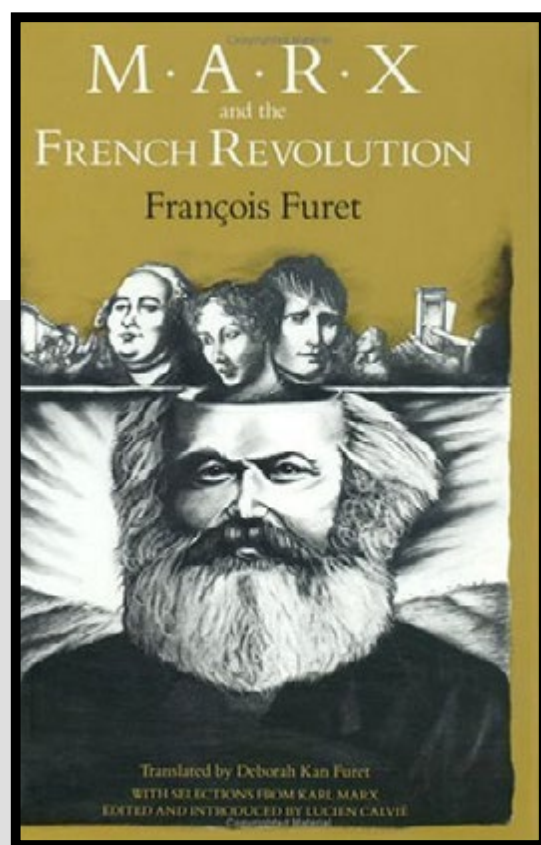
由主义的作用，而忽视了他著作中的政治哲学。自20世纪90年代起，安东瓦尼（Agnè Antoine）等人一边批判自由主义的缺陷，想通过托克维尔来嫁接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另一方面，战前J.P.梅耶就有《托克维尔是大众社会的预言家》论著。战后，对托克维尔的“大众社会”论也有了更深入的研究，最著名的是李斯曼的《孤独的大众》。1980年代之后，特别是托克维尔的草稿、书信不断被发掘出来，在欧美，托克维尔作为一个伦理学家也成为研究的一个领域。罗杰·博谢在托克维尔研究中强调，法国革命后现代社会已经失去了古罗马以来传统政治道德。

最近十年来，中国政治学界对托氏学说介绍虽然有不少进展，与欧美相比，到底还处于一种相对孤立和相当荒芜的状态。去年以来《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下子引起洛阳纸贵，恐怕也是出于学院派政治学学者和历史学学者预料之外的事情，因为之前不少我国研究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的学者也不甚高估托氏思想和著述的实用价值，而且去年热潮高涨之后，人们纷纷对这部著作的阐释，大多脱离托氏的其他著作和欧美同行的先行研究，独自围绕中国社会现状展开围绕“革命”的言说。原本谈论“革命”这个话题，总不能离开共产主义理论和运动的创始人马克思及其思想——对20世纪人类产生最大影响的思想。在这个热潮中，很少有人把“法国革命”与同一时代的卡尔·马克思联系起来是很令人遗憾的事情。但是，在这倾国共读《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三年前，2009年8月雷蒙·阿隆的《论自由》中文版

出版时，《东方早报》刊登过一篇余碧平的关于该书的书评《从托克维尔和马克思入手》，概括地转述了雷蒙·阿隆分析的托克维尔与马克思政治观的不同。即托克维尔认为：法国革命后，“传统贵族社会的各种社会关系完全解体，转变成由众多如原子般的独立个人组成的现代民主社会。最为重要的是，现代民主本质上已不仅仅是政治体制，或政府形式，而是一种社会生存状况。不过，这种社会生存状况如没有制度制衡，就会造成各种民主的暴政，即‘大多数人的暴政’”。“托克维尔非常强调保障个人自由的重要性，注重政治与法律制度的设计要以保护个人的政治自由为前提”。与托氏不同，旅居英国的马克思对工业革命时期无产阶级的“绝对贫困”现象感受很深，认为托克维尔等人倡导的“政治自由”只是“形式自由”，并不能直接带来“实际的自由”，即免于贫困的经济自由。阿隆分析说：“按照马克思的解释，由于社会化大生产的集中化要求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根本矛盾，就必然要求生产资料公有制；又由于无产阶级是剩余价值的创造者，而资产阶级只是非法占有剩余价值的寄生虫，所以‘剥夺剥夺者的无产阶级革命就不可避免。而革命胜利后，……在现实政治中，特别是在前苏联的政治实践中，无产阶级专政逐渐演变成了官僚集团的技术统治，不仅剥夺了大多数人民的政治自由，而且由于反对个人自由，也就在经济和管理上缺乏活力和创新。”余碧平在文章中，还联系当前现实，提到阿隆还对西方国家在政治自由与经济自由方面也存在许多问题的精辟分析：比

如，其政治自由如何受到企业管理制度、大众媒体和政党政治的操控和侵害；对哈耶克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批评，提出要防止哈耶克倡导的企业家自由创新精神可能导致的贫富分化。《论自由》中阿隆的这些分析一方面说明了他的注意力也转向重视托氏的政治自由主义论。另一方面阿隆暗示马克思的单纯的经济基础、所有制决定论的局限，政治体制控制意识形态对社会经济有巨大反作用。

阿隆作为自由主义“右翼”知识分子中熟读马克思著作出名的学者，批判马克思主义同时研读马克思著作，提到托克维尔不忘马克思。其实还有一位同时认真、深入考察马克思与托克维尔法国革命论的法国学者。那就是几年前我国出版的《思考法国大革命》的作者弗朗索瓦·傅勒。傅勒早年一度信仰马克思主义，加入过法共，原先是个左翼史学家，属于年鉴学派，又是当代研究法国革命代表学者（关于傅勒，《思考法国大革命》中文版序言中已经有比较详细的介绍，在此不再赘述）。因为早年的信仰，傅勒和阿隆一样，关注马克思的法国革命论，他另一本著作《马克思与法国革命》（Marx et Révolution Française, 1986），没有中文版是很可惜的。《马克思与法国革命》这本书严格说是傅勒和鲁塞·卡尔凡（Lucien Calvié）合作的著作，后者是著名的马克思研究者。卡尔凡搜集、选出了31篇马克思论及法国革命的文本，并为每一篇配写了导读，作为该书的后半部分。傅勒在《思考法国大革命》对托克维尔等人三种法国革命论作了评价，特别赞赏托克维尔对法国革命的



《马克思与法国革命》

评论，即革命后的政体继承、发展了革命前王朝正在开始强化的中央集权制度，后继的革命者继续了被他们推翻执政者的政策。而《马克思与法国革命》围绕马克思关于法国革命的历史观，进行分析、评论。兼听则明，见多识广，读读傅勒这样西方学者的马克思关于法国革命论的研究，对我们独立解读300多年来的各种革命论也会有一定启发。

在《马克思与法国革命》的开首，傅勒说出这项研究的出发点：

所有对法国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阐释都是在马克思之后产生的。这种滞后、矛盾的现象证明了所谓马克思主义，与所有伟大的教义一样，都不是出自创始人自身。这也让我们想起了，比如马克思也曾打算写一本关于法国革命的书，但是最终没有写成，实

实际上，马克思的一生不断对整个19世纪法国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无论哪一个事件都做过阐释。尽管马克思没决定写有关法国革命的专著，取代这项整体工作的是：他以陆续、间断的各种各样的考察文章，分隔了这件工作的整体，但是这依然可以成为我们研究的出发点。正由于有这样跨越很长年度间断的文本，我们可以把马克思从他的后继者们中解放出来，有可能还原他的思想本来的变迁过程及其提出的各种问题。

从卡尔凡搜集的文本来看，马克思分析法国革命不仅上溯英国克伦威尔革命，以英国革命作为参照物，还对法国19世纪发生的各个革命：1830年革命、1848年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作历史分析。他对法国革命的评价，构成了其政治理论的基准。傅勒发现并提出一个问题，也是该书论述的主题：马克思既然长时期关注贯穿19世纪法国各个时期革命，写了不少文章，或者说不少著述中涉及法国革命、革命这个重大话题，为何最终没有专门就这一论题写一部专著呢？傅勒读解这些文本后的结论是，马克思长期考察、研究法国历史和现状之后，恐怕最终没有能形成一个具有自信的决定性的结论。那些跨越很长年度的断断续续写成的各种文章，或结论（理论）彼此之间有自我矛盾的地方，或法国前前后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事实不能自圆其说对理论作出印证。傅勒看来造成这结果的原因，并非马克思学养不足，相反因为马克思不仅博学、而且掌握了大量的事实。问题是不少事实与自己既定的历史主义信仰有很大矛盾，让他感到困惑，自己

却又不愿意放弃预设的几个理论“原则”，所以马克思最终没有动手写一篇关于法国革命的专著。通读全书，笔者的感觉：傅勒并不是一味批判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法国革命观，也对马克思的长年历史研究中不断纠正自己的尝试性错误给与高度评价，力图把马克思的革命史观与他的追随者们的意识形态区分开来。

傅勒认为马克思对法国革命的理论归结之所以会最后难以把握，问题出在三个方面。1，通过费尔巴赫的唯物主义颠倒黑格尔的历史观，在社会与国家关系观点上，无法阐释法国革命迂回曲折的历史；2，在英国生活时间长，深受李嘉图、亚当·斯密经济学影响，坚持经济基础决定社会发展论；3，青年时期，受德国的哲学观念论的传统影响，使得他形成了抽象化了的修辞性的概念“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由此构成的阶级革命论难以与法国发生的现实事件一一对应。

黑格尔的历史观，国家不是从现实的市民社会中派生出来的，恰恰相反国家包容了市民社会，是超越市民社会一个整体，所以倒是市民社会从国家中派生出来。人是在国家或共同体内实现自由的。黑格尔这种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历史观依据的是古代希腊、罗马的共同体模式。马克思颠倒了黑格尔这一历史观，他从近代英国历史现实出发，受英国功利主义影响，人为国家是从市民社会中派生出来的，正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所以傅勒说，马克思考虑的出发点与英、法两国自由主义思想相同的，但是，面对同一个现实，自由主义者肯定，马克思

否定。之所以会出现这认识上分歧，傅勒认为对19世纪现实，马克思从洛克、亚当·斯密和基佐（François Pierre Guillaume Guizot）那里学到不少东西，但是对中世纪、更古的时期的评价，他多受德国传统历史学观点的影响。上述这一历史观也加深了他的经济基础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观点，他的观点走向极端：经济基础决定一切，是历史的基石。而建立在经济地位上的阶级作为一个抽象概念，很难在历史中与个人乃至具体的群体确切对应。傅勒强调后继者们的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本人的学说之不同，因为他从文本的研读来看，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将发生在资本主义成熟的西欧，经济基础、生产方式决定革命地域之限制。发生在德国以东各国的后来的革命，都是后继者们根据自己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并没有达到无产阶级的解放。傅勒认为马克思这个决定性的缺陷，都被他的后继者们（epigonos）推向更极端。也就因为坚持从经济决定论出发，所以马克思不能从理论整体上解释19世纪法国社会历史的动荡，不能把各个重大历史事件都归结源自经济领域的要因。这种历史观，把社会现象、历史现

象全部归结为经济基础、所有制决定的，政治没有一个相对独立的过程，全听从经济基础的安排。其实革命也好、历史重大事件，经济要因固然重要，文化、政治体制的重要性也不能忽视，许多历史事件的发生都是各种矛盾在一个时点汇合的结果，是一种偶然，所以假如要想从托克维尔著作中找到爆发大革命的规律——必然性，恐怕要失望的。

马克思这一历史观影响了整个20世纪的进程，即使哈耶克这样的自由主义思想家，表面看来与马克思主义对立的，但是他的所有制决定是否走奴役之路理论本身也是一种变相的经济基础决定论。可见马克思影响之大。许多批判哈耶克的学者都指出，走向奴役之路的第一步都是从政治和意识形态革命开始的。意大利、德国都没有彻底颠覆私有制经济基础，国民在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政治“改革”下同样走上了被奴役之路。

傅勒这一学术探索中的种种观点不一定正确，笔者的解读也许更是谬误百出，写这篇短文只是希望在21世纪的今天，谈起革命我们不要忘记马克思及其学说。❶

寂静的阿卡迪亚



特约撰稿人 罗四鸽（美国·波士顿, luosiling@gmail.com）

在阿卡迪亚国家公园的第二天清晨，我突然听到唧唧几声虫鸣，寻声而去，发现小客栈边上居然有一小块杂草丛生的空地，进入草丛，只见一段废弃的铁轨、几片白色垃圾，再也听不见虫鸣。在几日前的TED Talk中，刚好看到美国生物声学家伯尼·克劳斯（Bernie Krause）阐释大自然的声音。他认为在这个星球上，每一个生物的声音都有其独特含义，蚂蚁、昆虫的幼虫和病毒都会通过声音“说话”，若是人类能听懂的话，是可以从其声音判断其健康的。其中，克劳斯所举的一个例子便是林肯草原。多年来，他一直在那里录制昆虫的声音。1988年，一家木材公司在草原进行了有选择的采伐。从表面看，草原没有发生多大变化。然而，一年后，录制的昆虫的声音却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可是，谁会去认真倾听它们的鸣叫呢？站在草丛中，我突然明白了美丽的阿卡迪亚哪里不对劲：寂静。除开人声的喧哗外，即便在森林深处，也未能听见一声鸟啼

或是蝉鸣，更别指望草丛中能传出虫子们的奏鸣曲——这却是我所怀念的大山里的童年生活背景，也是克劳斯在TED中首先让听众倾听的声音，更是在1962年9月27日出版的《寂静的春天》中，蕾切尔·卡逊所痛惜的。

1957年，为了消灭吉普赛飞蛾、毛毛虫和蚊子，美国农业部和有关州政府对长岛地区连续14次喷洒了混在燃料油的DDT农药，造成大量的鸟类死亡，池塘、土壤受到污染。一群长岛居民在鸟类学家罗伯特·库什曼·莫非的率领下曾上诉法院，试图阻止此次喷药，却被法院驳回，DDT按原计划喷洒。密切关注此案的《波士顿邮报》前编辑奥尔加·欧文斯·哈金斯也发现，1957年夏，麻省州政府的一架飞机喷洒DDT归来，飞过她和她丈夫在达克斯伯里的两英亩私人禽鸟保护区上空之后的第二天，她的许多鸟儿都死了。1958年1月，她给她的朋友蕾切尔·卡逊写信，希望卡逊能在华盛顿找到一

位能帮忙的人，阻止类似的喷洒行为。

当时51岁的卡逊已经是著名的生态学家了，《海风下》《我们周围的大海》《海的边缘》等三部著作的成功，让她获得了经济上的独立。1952年，她从渔业与野生动物局辞职，专门从事写作，并在缅因州的一片沙滩上买了一个小木屋，以便在海边散步观察大海中的生命。在接到哈金斯的信后，卡逊放弃了她原定的写作计划，决意写一本关于杀虫剂危害的书，虽然此时她已经确诊乳腺癌，并遭遇丧母之痛。

实际上，早在1945年，卡逊就对农药的使用提出过质疑：“如果使用不当，是否会打破大自然精致而脆弱的平衡呢？”在收到朋友哈金斯的信后，卡逊决定花一年时间写一篇关于杀虫剂的文章，结果是花了四年半时间写成一本书。“已经到了必须写这本书的时刻了，在摧残这个星球的路上，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了。”

在这本书中，卡逊以科学家的严谨，用触目惊心的事实证明“由于化学杀虫剂造成的生态灾难，地球将变为了无生气的墓地，即使在春天，也是一个没有鸟语花香，没有蜂飞蝶舞，没有蛙叫蝉鸣的寂静的春天。”1962年6月16日，《寂静的春天》开始在《纽约客》上连载，立即激起强烈反响，卡逊本人甚至遭到威胁与恶毒的人身攻击。其中最猛烈的反击来自于化工业巨头。如一家孟山都的公司，也写了一本小册子《荒凉的年代》，讲述杀虫剂如何大大减少了疟疾、黄热病和伤寒等疾病的发生。若是没有杀虫剂，各类昆虫猖獗，人类生活便会陷入混乱，将生活在荒凉的年代。《纽约时报》有



《寂静的春天》

文章指责卡逊，其理论“过于简单化以及彻底的错误”，“使用煽动性的情绪化的语言”去恐吓大众。甚至一些科学家认为卡森只是“一面之辞，歇斯底里”，“如果人们都忠诚地听从卡森女士的教导，那我们可能回到黑暗的中世纪，那时候昆虫、疾病以及各种害虫就会再次在地球上肆虐。”虽然此书得罪不少利益集团，却得到民众的欢迎，当年销售50万册，巨大的反响惊动了当时的肯尼迪政府。总统肯尼迪任命了一个特别委员会来专门调查《寂静的春天》中所列的事实，最后委员会证实卡逊并非危言耸听。1970年美国环境保护署成立。1972年杀虫剂禁令颁布，曾因其有效灭蚊子控制疟疾传播而获得1948年诺贝尔奖的DDT在美国销声匿迹。同时，这本小书也启动了现代环保运动。1963年，卡逊在国会作证时，参议院阿伯拉

罕·李比克夫模仿林肯一个世纪前对《汤姆叔叔的小屋》的作者斯托夫人的话，对她说：“卡逊小姐，你就是那个启动这一切的女士。”

毫无疑问，在DDT单个问题上，卡逊赢了；然而在杀虫剂与环境问题上，卡逊挑起的这场战争却变得更加艰巨。实际上，卡逊所质疑的不仅仅是滥用农药与环境的污染，还有更重要的金钱污染与政治污染。“一些主要的化学公司正在把金钱倾倒到大学里以支持在杀虫剂方面的研究工作，这种情况产生了吸引研究生的奖金和有吸引力的职位。”“在美国仅有2%的经济昆虫学家在从事生物控制的现场工作，其余98%的主要人员都被聘去研究化学杀虫剂。”而“农业部不对所使用的化学物质的既有知识进行最起码的调查，而盲目去执行它的计划；即使进行了调查，它也将所发现的事实置之不顾。”因此，这场战争的结局，戈登副总统在为《寂静的春天》再版所写的前言中已道明：一方面，DDT虽然已禁止，然而“自《寂静的春

天》出版以来，仅农场用的农药就加倍到每年11亿吨，危险的化学药品的生长增长了400%”“1992年，我们国家共用了22亿磅杀虫剂，这等于人均8磅”；另一方面，

“《寂静的春天》出版22年，法律、法规和政治体制都没有足够的反应。”对此结局卡逊或许并不会感到意外。在生前最后一次演讲中，她已断言：“杀虫剂的问题会因为政治问题而永远存在；清除污染最重要的是澄清政治。”

从阿卡迪亚回来后没几天，在网上看到一张饿死的北极熊照片，这只以脂肪闻名的动物，瘦成“地毯”，静静地趴在地上。

《寂静的春天》首页致辞立即出现在我的脑海里：“献给阿尔伯特·史怀泽。他说：人类已经失去了预见和自制的能力。它将随着毁灭地球而完结。”这也是阿卡迪亚的清晨，我伫立在寂静的草丛中所能想到的。

8月21日，叙利亚至少有1300人死于生化武器袭击。两日后，网络上响起一位叙利亚女孩惊恐地尖叫：“我还活着，我还活着”。

靖国神社问题“发酵”的前前后后



特约撰稿人 刘柠（北京，postdadaist@gmail.com）

每年临近“8·15”，中日两国都很神经兮兮：中方睁大眼睛，死盯着日本政客的每一个动作，包括桌面下的“小动作”；日方虽说也“谨小慎微”，仍不免“动辄得咎”。如今年“8·15”，共有105位国会议员参拜了靖国神社，其中包括安倍内阁的3名阁僚。另有约100名国会议员由秘书代为参拜；而首相安倍晋三尽管未亲自参拜，却以自民党总裁的身份，自费敬献上了一份“玉串料”（即祭祀费）。安倍的这种“小动作”，虽然注定会挨右翼的骂，却也逃不脱中方的“记过”，可谓两头不讨好。

说靖国神社问题是一颗定时炸弹，实不为过。只是定时炸弹之所以恐怖，在于它不知将于何时爆炸，而靖国神社这枚炸弹，爆炸时限似乎被“约定俗成”地设定于“8·15”这一天。也不是没有其他的参拜日，如春秋两个大祭，分别为4月21日至23日和10月17日至20日，按说也相当重要，但惟其少了所谓“终战日”的政治象征性，

一般来说，不被看成是国家祭祀，似乎有种“罪轻一等”的意味。有些“狡猾”的政客（如前首相小泉纯一郎），会刻意避开“8·15”，而在春秋大祭时参拜，实际上是充分评估了“中国风险”（主要是中方，其次还有韩国）后的策略性选择。安倍多半也属于这种政客。

对日本来说，靖国神社问题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并持续“发酵”，并非“祸起萧墙”，而是中韩等“境外势力”外压的结果。当两国关系比较默契，得以维系某种良性互动时，这种外压可起“制动”的作用；相反，当两国交恶，良性互动变成恶性循环，彼此展开口水战时，外压不仅难以“制动”，甚至有可能变成“助燃剂”、“起爆剂”。当然，这并不等于说舆论反制是错误的、无效的。而是说，在两国关系逆转、情绪性对抗加剧的情况下，你的反对和批判，恰恰可能成为对对方行动“意义”的变相“承认”，甚至为他在国内的政治博弈造势、加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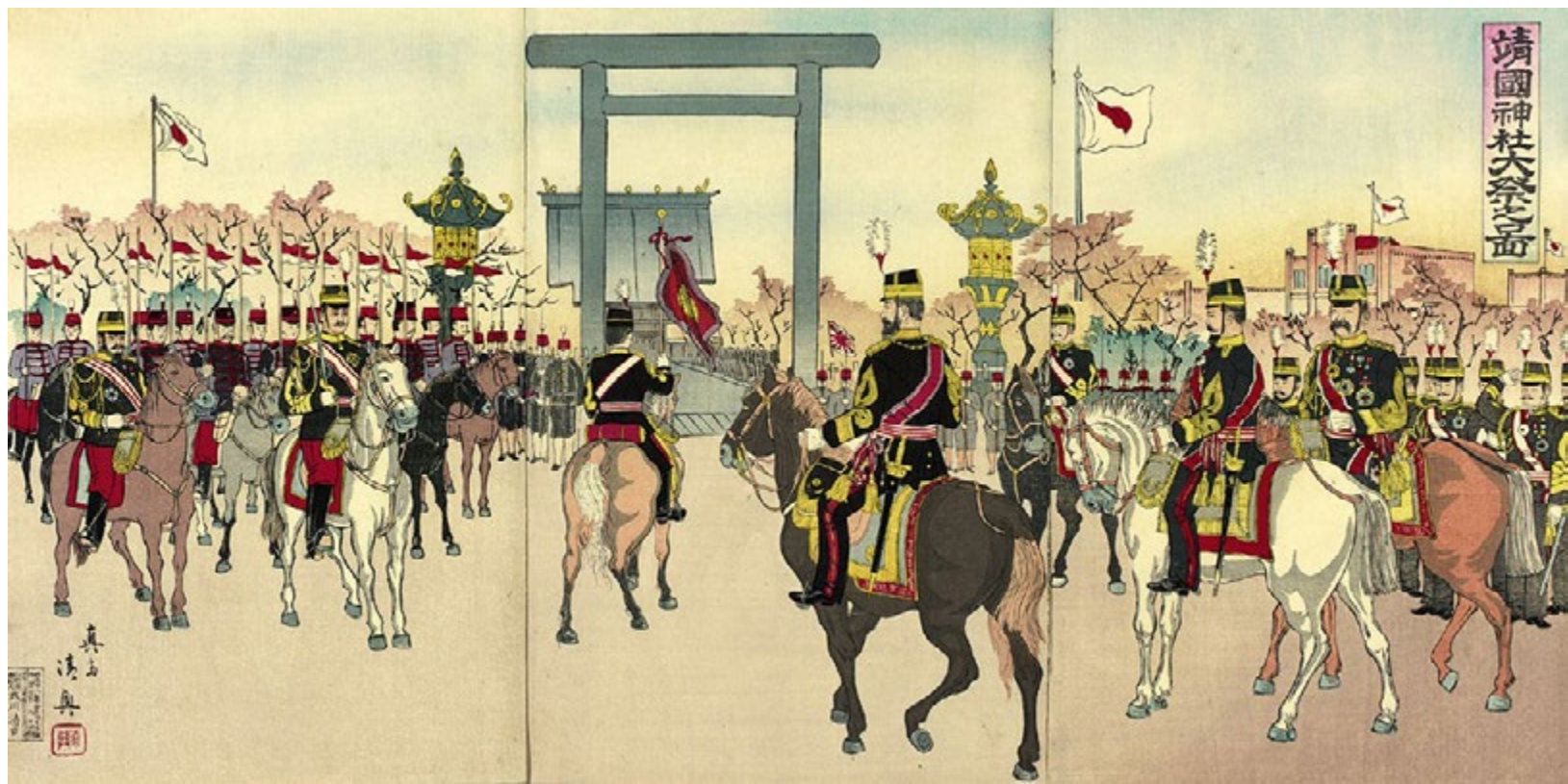
回顾中日两国围绕靖国神社问题的漫长拉锯战的全过程，不难看到：问题最初的“发酵”，确实源于中方的“外压”。但好在彼时中日关系正处于“蜜月”期，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互信机制尚未破坏，一度“发酵”的问题未至扩大化。

始建于1869年的靖国神社（原名为东京招魂社），由于在二战时期扮演了国家神道象征的角色，在战争意识形态的建构中发挥过重大作用，对国家政治发生过举足轻重的影响，战后曾经历了一场存废之争。后因美国着眼于对日占领稳定性及东西“冷战”的考量，靖国神社得以保留，从战前由陆军省和海军省共同管辖的招魂设施变身为特殊宗教法人。战后，靖国神社当局预料到陆海军部即将被解散，遂临时决定于1945年11月19日举行祭祀，将尚未合祀的一般战死者一起招魂合祀。截至1967年10月，靖国神社分四次实施了对乙丙级战犯亡灵的合祀。1987年10月17日，在家属都不知情的情况下，靖国神社当局又把在远东

军事法庭上处刑的十四名甲级战犯的亡灵悄悄地合祀进来。至此，靖国神社合祀的构成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据说，昭和天皇（裕仁）出于皇室的“洁癖”，生前从此再未参拜靖国神社（昭和天皇及皇后最后一次参拜是在1975年11月）。

对靖国神社合祀结构的变化过程，中方当然是知情的，但并未视为问题，自然也没有表示明确的反对。不仅如此，战后历任首相中，从吉田茂、岸信介、池田勇人、佐藤荣作，到三木武夫、福田赳夫、大平正芳、铃木善幸等都曾在首相任上以私人名义参拜过靖国神社。任上未参拜者绝对是极少数派，连被认为史上“最亲中”的田中角荣也曾首相任上参拜过5次，却从未见中方抗议。

靖国神社问题的初次爆发，是在1985年8月15日——首相中曾根康弘以内阁总理大臣的身份参拜了靖国神社，成为战后第一位在“8·15”当天，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的现任首相。说是第一位，其实也是唯



——一位以公职身份靖国参拜的现任首相。
即使是后来跟中方彻底闹掰的小泉纯一郎，虽然在6次靖国参拜的最后一次，选择于“终战日”当天参拜，但究竟是以首相的公职身份还是私人身份，其实是刻意做了暧昧化处理的。

中曾根康弘，这位前帝国海军中尉、大藏省官僚出身、29岁即当选国会议员的踌躇满志的政治家，是自民党内的实力派精英。成就自己的政权之前，履历丰满，历任过几乎所有的重要阁僚，从交通相、通产相，到科技厅长官、防卫厅长官，不一而足。作为首相，在任1806天，是日本现代史上第六位长期政权，也是公认最有作为的“宰相”之一。中曾根内阁时期，日本经济如日中天，自信爆棚，在国际社会的“存在感”大增。对外，出席八国峰会（G8），与中美协调，构筑了建基于共同利益及领导人之间个人交情之上的大国关系；对内，向垄断宣战，拆分国铁、日本专卖公社和电（信）电（话）公社，大刀阔斧地推进民营化改革。中曾根其人政治成色保守，即使在自民党内所谓“中道保守”的谱系中，也属于偏右者，有较浓厚的鹰派色彩。以靖国参拜而论，他是战后历代首相中参拜次数最多者之一，多达10次，仅次于佐藤荣作的11次。他鼓吹“新国家主义”，主张日本的“普通国家”化、核武化和修宪。在二战结束40周年之际，他公然揭橥“战后政治总决算”的纲领，试图为“大东亚战争”正名。正是在如此背景下，1985年的“终战日”，“内阁总理大臣中曾根康弘”的名字出现在靖国神社的参拜贵宾签到簿上。

这下子可炸了锅。说“炸锅”，不是在日本，而是炸在中国。学者杨继绳说：“1985年9月是多事之秋。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和十二届四中全会；另一方面，出现了一次规模不大不小的学潮。”

（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Excellent Culture Press，2004年11月，298页）——中曾根的靖国参拜像一粒火星，溅到了邻国的油锅里，引发了这场学潮。8月底9月初，北大“三角地”率先贴出大字报，矛头直指中曾根康弘，抨击“复活军国主义”，兼涉及日本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呼吁纪念“9·18”，去天安门游行。“9·18”当天，在校方及海淀公安分局民警的阻拦下，大部分学生未能走出校门，只有数百名冲出校门的北大学生和其他高校的学生在天安门广场集结，高喊“爱国无罪”、“反对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等口号，并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献了花圈。

“9·18”过后，事件仍未平息。“北京一些高校里继续有大字报出现，或声援北大，或抗议日本对华贸易政策，或批评政府。10月1日，西安有数千名学生上街游行，烧了几家商店门前的‘日本照相器材展销’的横幅。10月7日，成都人民南路的游行队伍达万人以上。”（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299页）

是年，日本著名作家山崎丰子应邀访问北京。一到北京，她便感到了空气中的肃杀，“不习惯寒冷的我，马上穿上皮大衣，戴上皮帽，但还是禁不住直发抖”。“立于北京的闹市区东单街角上的大告示牌上，张贴着揭露战争中日军残暴行为的照片，人

群聚集，我整个身心都在打战。”（山崎丰子《“靖国批判”中的北京》，《文艺春秋》，1987年4月号，下同）北京夏秋以来的动向，也极大影响了她的采访进度：“直到夏天都还相当顺利的采访预约，9月中旬以后，突然变得难以推进，一筹莫展。尤其是涉及国家机关各部委的采访，一概被拒，理由清一色是‘生病’、‘长期出差’等，就像约好了似的。……安倍（晋太郎）外相、樱内（义雄）前外相访华时，也未能见到胡耀邦。在这种情势下，连原定于11月中旬与我的会见也被取消了”；“随着靖国神社秋季大祭日的临近，北京大学的学生运动越发激烈，校内的大字报开始批判胡耀邦，胡被打上了‘中曾根首相的老朋友、亲日派’的烙印。”然而，就在山崎正陷于绝望的时候，却得到中方通知——与胡耀邦的会见“复活”了，而且日期就定在“12·9”运动50周年纪念日的前两天。

山崎丰子在回忆文章中记录了拜会胡耀邦时的谈话要点。针对“8·15”前后，中国社会上流传的所谓日方在宝钢引进项目中“以次充好”、“强行推销”等传言，山崎说：“我并不是说只希望对日本给予好评，特别是关于宝山钢厂项目，西德只承担了无缝钢管的份额，而日本则是连续七年零八个月致力于合作，共投入千余名技术人员。其中有些人跟中方从业员一样，住在没有空调的车间小屋，加班加点。对这种日方的合作非但不予承认，中方的一些报纸，还刊登所谓中国被日本骗了、遭人强买强卖等报道，弹劾日本，这是非常遗憾的。希望媒体要公正报道。”对此，胡耀邦表示：“你说的这

个问题，我并不知情。但公正报道是很重要的。”

山崎接着说道：“再有，在学生的反日游行中，打出了‘经济侵略’的口号。对一个主权国家推行的计划经济，是不可能实施侵略的，而且日本应该也没有强行推销。”胡马上说：“呵呵，那个口号是不正确的。当然也还有其他不正确的口号，甚至有过‘胡耀邦是亲日派’的口号。要把十亿人的意志统一成一个是不可能的。今天，也有不赞同党和国家做法的人，但人数很少。中国有句谚语叫‘丑儿家家有’，说的是哪家都会有一个样子长得不济的丑娃。”

最后，话题切入靖国神社问题。胡耀邦说道：“我不会同一件事反复谈，正式的意见，我只谈一次。我想说的是，我们决不是干涉日本的内政。但希望日方也要注意不要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中国受八国联军侵略，过了85年，记忆才好不容易变得淡薄了一些。而抗日战争刚过去40年，怎么也要再过40年左右，才有可能淡然面对。这点也请贵国予以考虑。”“他声调不高，绝无一点盛气凌人的感觉”，山崎回忆说。

进而，谈到战犯的合祀问题。参加会见的日本驻华大使中江要介插话说：“某种意义上，乙丙级战犯是甲级战犯的牺牲。日本持这种看法的人所在多有。”胡听后，说道：

“我的想法是，中国在文革中蒙冤的人，即使死后也在进行平反昭雪的工作。我自己便负责过这方面的工作。日本也可以对乙丙级战犯加以甄别，对蒙冤者，可以考虑恢复名誉嘛。”对胡的建议，山崎以曾创作过远东国际军事审判题材的长篇小说《两个祖

国》的作者的角度，认为乙丙级战犯是根据联合国军司官麦克阿瑟的条令作出的裁决，

“作为一个现实问题，‘恢复名誉’是绝对不可能的”。

会见持续了两个半小时，双方都相当坦率。山崎在会见后于北京的日本大使馆召开的记者会上，对记者透露了自己的真实感觉：靖国神社问题绝不是一次性的问题，也不是敷衍一时就能解决的。“我深切感到，这是一个在了解人的心痛的基础上，务须加以慎重解决的问题。”从山崎丰子的回忆可知，胡耀邦在围绕靖国神社问题的中日协调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不仅对日方，胡耀邦还在中方内部做了大量的工作，以避免事态的进一步“发酵”。据彼时担任中宣部长的朱厚泽对杨继绳回忆：“从北戴河假期办公会议回到北京后，正赶上‘9·18’北京学潮。中曾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这一年正是中国纪念抗战胜利40周年。中日贸易逆差达，日本进口的机器有的质量不好，还传说宝钢引进日本的设备吃了亏等等。说是日本人‘第二次侵华’。学生上街游行。9月18日到23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在京举行。党代会上决定处理学生问题的方针：党委领导人要深入到学校和学生直接对话。这是第一次用‘对话’这个词，是胡耀邦提出来的。按这个要求布置下去了，孙平化、符浩等外交官员给学生讲中日关系，澄清一些被误解和被歪曲的问题。由于党委不回避尖锐问题，实事求是，直接和群众对话，思想工作做通了，学潮平息了。”（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299~300页）杨继绳认为：“这次

平息学潮，没有动用军队，没有政治恐吓，领导干部和学生平等对话，疏导，是这次平息学潮的主要方法。这是胡耀邦处理学潮的指导思想。”（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300页）

当然，胡耀邦所做的这些协调、疏导工作，如果得不到日本领导人的善意回应，从而激活中日间的良性互动机制的话，恐怕再多也会流于无用功。好在中曾根与胡之间有着基于个人交情基础之上的互信。1983年11月，胡访日时，在日本国会演说，应邀到中曾根的家中做客。礼尚往来，后中曾根访华时，也曾到胡的家中回访。邀请3000名日本青年访华，成立“中日友好二十一世



纪委员会”，可以说都是胡与中曾根互动的结果。关于中日关系的发展问题，针对胡提出的“和平友好、互惠平等、长期稳定”的“三原则”，中曾根补充了一点“相互信赖”，当即得到胡的赞同，遂有了后来所谓“四原则”。

中曾根其人保守归保守，但绝对重视中日关系，尤其对来之不易的两国领导人个人友谊所维系的良性互动格外珍视。虽然从政治立场上，对自己1985年“8·15”的公职参拜，他从未表示过后悔，但却从翌年起停止了参拜。据其在2004年出版的回忆录《自省录——作为历史法庭的被告》（新潮社，2004年6月，137页）中透露，让他做出停止参拜决断的，“除了对（日本）国内外的形势做出的伶俐判断外，一个决定性的要因是意识到胡耀邦也许会因我的参拜而遭弹劾下台的危险”。

他先是派外相安倍晋太郎（即现任首相安倍晋三之父）去中国，与吴学谦外长接触，谋求协调。安倍回国后，如实地向他汇报了访华的感触。继而，受中曾根之托，新日铁公司前社长稻山嘉宽借赴北京商务出差之机，顺便打探“中方在靖国参拜问题上的真意”。据中曾根在回忆录中记述，稻

山临回国的前一天，清晨6点，时任书记处书记的谷牧、副总理万里两位“开明派”官员，“面带紧张、严肃的神情来到他下榻的酒店”，表示：“（靖国参拜问题）将给中国的内政带来很大影响，会陷耀邦总书记和吾等于非常困难的境地。务请向中曾根首相转达望停止参拜的希求。”

至此，中曾根才算彻底明了问题有多深刻。正是出于对私交甚笃的胡为首的所谓中共“开明派”的支持，中曾根才适时地做出了中止参拜的决断。事实上，作为自民党内保守派政治领袖，中曾根也为这个决定付出了代价：1986年8月，因他没能继续参拜靖国神社，首相官邸曾收到过寄自极端右翼团体“赤报队”的弹丸。

中曾根之所以不惜政治代价“挺”胡，显然是意识到胡已成国内保守派的“目标”。如果胡被迫“失脚”，保守派卷土重来的话，不但将葬送“半吊子”的中国改革，对日本和世界也没有半点好处。可尽管如此，中曾根的苦用心仍未能“挽狂澜于既倒”，不过这是后话了。就靖国神社问题的最初“发酵”及其应对而言，中曾根康弘与胡耀邦之间的良性互动，确实是一次不小的成功——可惜，却是唯一的一次。❶

禅修的“本来面目”

——从梁朝伟的法鼓山禅修之行说起



观察员 成庆（上海，veron.cq@gmail.com）

初入法鼓山，一般都会对此地特有的静谧氛围印象深刻，常让人有不忍高声言语之感。除了周末或法会期间，平日在大殿、祈愿观音殿、斋堂等处能看见少许参访人流外，常会感觉此地空无一人，满山渗出的都是清静寂寥。

这样的清修之地，按照一般的想象，大概很难与娱乐新闻挂上钩。不过日前，法鼓山也享受了一次娱乐版面的待遇。“天王”梁朝伟悄无声息地上山，参加四天三夜的禅修营，结束之后被媒体曝光，大小娱乐媒体火力全开，争先报道天王此行活动的细节。

对于法鼓山而言，禅堂是全山的灵魂所在，方丈和尚也不能随意介入。平日里，禅堂大门紧闭，严禁外人出入，参加禅修的禅众也不允许携带手机、相机及任何电子设备，所以梁天王在禅堂里的四天三夜到底怎样的情形，无人知晓。其实参加过法鼓山禅修的大概都知道，一旦入了禅堂，没人会

正眼瞧你，更不会背后指指点点。媒体当然只能进行各种揣测臆想，例如天王隐匿法鼓山，其实是因为婚姻危机，又说，禅修期间其他人都未发现身旁乃是“天王”真身，直到结束时方知大明星隐身其中云云，真可谓是各种天马行空。

近日巧遇认识的法师，负责天王禅修期间的监香。谈及此事，说天王虽剃了头，形象有变，依旧气场十足，洋溢着“贵族式的气质”，仍然容易辨识。不过禅修期间完全止语，就算其他人认出是“天王驾到”，大概也无机会相互议论。

对于法鼓山而言，明星入禅堂，并不是第一次，算不上稀奇事。昔日的大明星林青霞早年因心灵上的困惑上山求教圣严法师，法师并无多语，只是让她进禅堂，而且连说三遍，她才真正下决心去体验正经八百的禅修。关于那次禅修的体验，林青霞还曾专文回忆，谈及虽只有短短三天，却让她终生受益。

明星禅修，自然足以赚够大众的眼球，能让更多人了解到明星生活的另外一面。只是大部分人看到这样的消息，难免会认为，明星躲入深山禅修，肯定是因为生命、事业受到挫折，将佛门当作短期的避风港而已。这种“逃避”的想象是很多人对于佛教的流俗理解，甚至还听到有人评价，如今的禅修只不过是“心灵鸡汤”，完全是中产阶级的“精神度假”，禅修的人大多对世间不公平缺乏敏感，完全是一种自我麻木与催眠。

这样的批评不可谓不尖锐，乍看起来也似乎相当敏锐。不过仅仅从一群人躲进禅堂里的表象上来认知禅修的内涵，这样的评论也多少有些隔靴搔痒。

禅修是什么？是坐在那里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作？还是说，出家人有什么神奇的法术，可以几天之内让心情迅速平静，甚至能看破红尘滚滚？

许多人对于禅修的想象，大概只停留在这样的层面，甚至有些多次参加禅修营的佛教徒，也多少会有这样的误解。于是，佛教不断地被打上“消极”、“逃避”的烙印，对一些参与的人而言，禅修也好像是阿司匹林，一旦在世俗生活中遭受些许不如意，就指望禅修作为特效药，可以迅速止痛，然后可以继续投入红尘，迎接新一轮人世间的惊涛骇浪。

如果这就是佛教禅修的目的，那么当年的悉达多王子应该继续住在皇宫中逍遥自在，一旦遇到问题才会驰马出宫，寻找一粒“禅修阿司匹林”。事实上，在佛陀时代，各种修行人（如阿罗罗迦罗摩）早就熟稔禅修的种种技巧，而且在“心止于一处（定）”的修行境界上，尚未开悟的悉达多还需要去拜师求教。可是悉达多王子却发现，坐在那里享受“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作”，并不



能解决他的烦恼，因为禅坐永远只是暂时解决问题，人生的大部分时间仍然要与自然、人群交道。当悉达多王子躲入深山，日食一粟，接连打破各种禁食的吉尼斯纪录，仍然未能根本解决人生的烦恼问题。直到他意识到苦行无效，吃下牧羊女的乳糜，端坐于菩提树下继续禅修，经过七七四十九日，才终于证悟，获得圆满的智慧解脱。

在佛陀余下的人生岁月里，我们并没有看到一位纯粹避世的隐逸者，也不是看到一位半日纵欲半日禅坐的“心灵鸡汤修行者”。佛陀所作的一切，是去不间断地弘化佛教的正见与修行方法，如果说那个时代有“模范教师代表”的荣誉证书，我想，应该没有人会反对可以授予佛陀。

那么，为何现代人会把禅修看成是“消极”、“逃避”呢？显然，这并不是佛陀的问题，而是我们自己错解了那位“模范教师”的本怀。或许有人会问，那佛陀本怀是什么？禅修到底追求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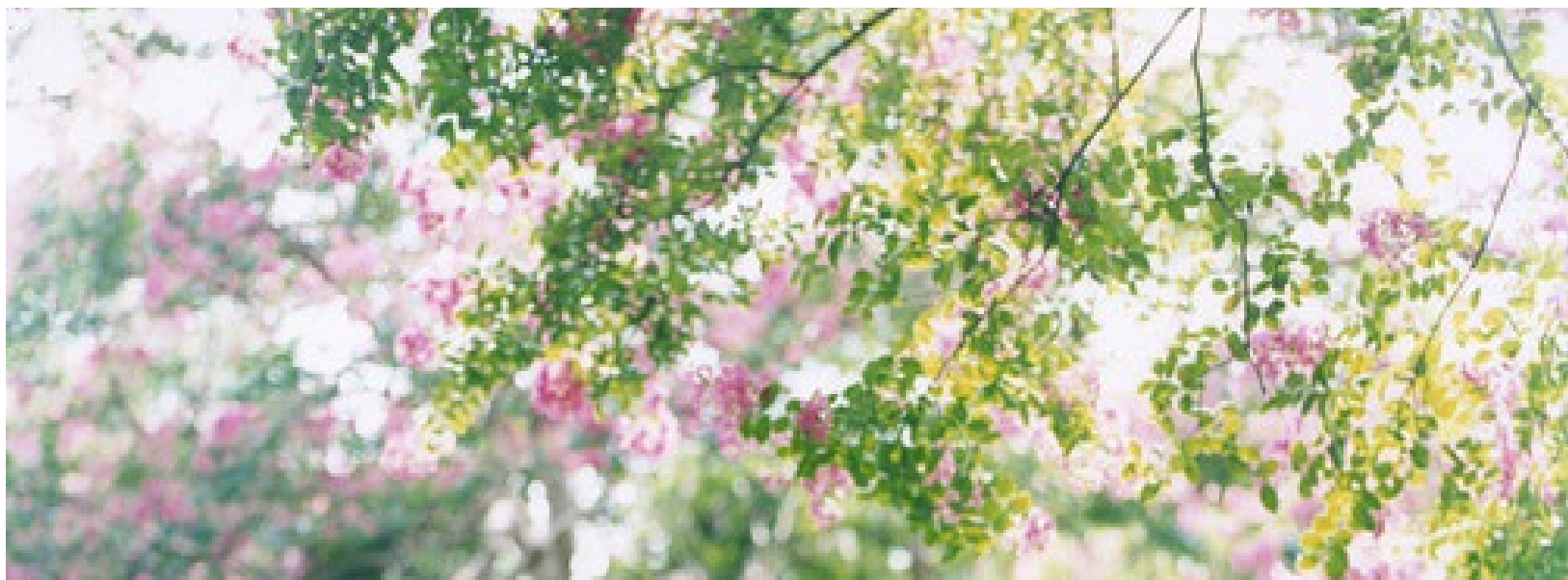
很抱歉，这个问题显然超过了这篇短文所能承担的使命，不过，一旦当你有这样

的发问，接下来你或许应当着手准备一趟有趣的智慧旅程。因为佛陀从没有说过，他能够用神杖点一下你的头，就能获得智慧。或许这会让很多人感到沮丧，所有的修行都只能是个人努力、个人完成，佛陀或者僧人只能充当老师，就好比苏格拉底口中“灵魂助产士”的角色。说到这里，似乎已经距离我们习惯认知的“求神拜佛”的佛教形象越来越遥远了。

在台湾，“求神拜佛”的佛教形象经过三十多年来僧团的努力，得到极大的改善，那种“烧香拜拜”的民间信仰与佛教之间的差别基本上泾渭分明。在法鼓山上，甚至已经没有传统寺庙中供香客使用的香炉，信众进入殿堂，只需礼佛三拜表达尊重即可。

在这里，如果你试图了解佛教的“本来面目”，最为直接，往往也最为有效的方法其实就是进入禅堂，按照所教的各种方法慢慢观察自己的内心。佛教并不是告诉你，内心之外另有可寄托的救赎者，而是让你了解，你应该去寻找你自己的“本来面目”。

一再重复的青春



特约撰稿人 朱白（广州，youjinma@gmail.com）

青山七惠的青春故事讲的太好，以至于从一个陌生异国的名字，到被中国读者熟知乃至被高频率的出版，只有短短几年。如今你看到印在书封面上的作者名字字号已经逼近书名的大小了，可见青山七惠在中国受欢迎程度。

但同为严肃作家和被读者广泛喜欢的作家，青山七惠跟雷蒙德·卡佛在中国所受到的待遇又不尽相同。卡佛更容易被评论成中国人一贯喜欢的苦大仇深式的作家，他的生活经历和创作履历也容易给人以这样的口实，甚至他身上的被生活打磨过的遭遇也成了人们阅读小说时一种必须自我营造的噱头。而青山七惠的读者除了传统的严肃文学爱好者，也不乏单纯的青春题材读者，比如校园文学或者郭敬明那一系列杂志的读者，也会对青山七惠产生好感。换言之，青山七惠从读者层面上大大扩展了严肃文学的广度。但相比人人都愿意口吐两句卡佛的金句，好像愿意谈论青山七惠的职业

批评家和媒体人并不多，或者他们觉得这是一个让人跌份的名字，因为太多看上去轻薄的读者追捧这位作家了。这，当然也是我们的一贯短见。

《紫罗兰》讲述了一个尝试写小说的生活中非常拧巴的中年女性故事，当然视角仍然是一个女学生，你可以想象成这是青山七惠本人在十几岁时的一种观察视角，以及可能遇到的故事。“雷米”是化名，真名叫紫罗兰，寄居在大学同学夫妇的家中，在他们女儿女中学生即叙事者“蓝子”的审视和观察下，她是一个可怜可爱的人，不爱工作，满脑幻想，喜怒无常背后还有复杂的感情经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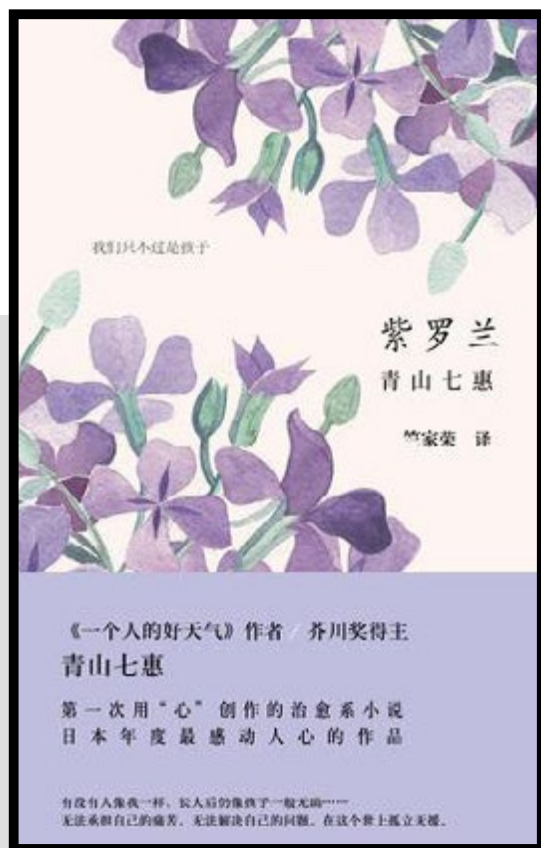
“雷米”被大学同学因为怜悯而收留，她有过自杀经历，并且对周围环境有着强烈的冲突感，既让人感到不舒服不理解，也对周遭发出了自己的不和谐之音。这种别扭和冒犯，是双方的。“蓝子”的父母都是日本正宗的中产阶级，过着正常无比的世俗

生活，他们接纳并帮助“雷米”走出困境，让“雷米”像家人一般呆在家中，而此时年少的“蓝子”正值叛逆和情窦初开的中学生时节，她们成了某种莫逆之交，并在冲突和交融中完成了共同成长的经历。

已经中年还保持大部分时间单身的“雷米”和中学生“蓝子”成了亲密朋友，对此作者青山七惠给予的隐约解释是两人先后都是写小说的。“雷米”在大学期间和恋爱受挫被自己拘禁在家中时，都是以写小说来打发时间，她创作的类型和内容不得知，但的确一直在写；而年少的“蓝子”自从不经意间说出自己的梦想是小说家时，便开始鬼使神差地接近这个理想，小说中最后交代“蓝子”长大成人后已经成了以写小说为职业的人。

总体来说，青山七惠没有继续带给她的读者惊喜，而是用一种对于她自己来说老套、重复的内容和节奏，“打发”掉了一次小说创作。如果说缓慢的节奏、清新的风格、漫无目的的主人公、淡淡忧伤的情绪是青山七惠小说的特点的话，那么这样一部《紫罗兰》可以称之为是被丢进其小说流水线上制造出来的产品——无论是外观形态，还是内在核心都无比“青山七惠”。

按照简体中文版的出版顺序，《一个人的好天气》《窗灯》《温柔的叹息》《魔法师俱乐部》《碎片》《离别之音》《新娘》《我的男友》《紫罗兰》，除了《我的男友》因为翻译不忍卒读之外，其余我都看过（不是非要守着竺家荣的翻译，而是新译者林青华的语言、语气都显得极其做作，与作者原貌相差太远），比较而言，当然是



《一个人的好天气》最为惊艳，接下来的从《窗灯》到《新娘》也都非常相当迷人，尤其是两部稍长一点的《魔法师俱乐部》、《新娘》不仅体现了青山七惠的一贯接地气的抒情气质，也还有对于小说的艺术追求，结构的匠心和叙事上的求变也被读者轻易就能观察到。

可是这种对于作家来说向上的、精致的、气定神闲方向的变化，到了《紫罗兰》却戛然而止，青山七惠不再提供可供揣摩和玩味的情绪，以及那种青春里无比值得重视的细节，只是用一个貌似青春无邪和社会边缘人物结合的外套，将这么一个简陋而无意味的故事装了起来。尽管仍是“青山七惠”牌的，但成色和底蕴已经相差不少。

《紫罗兰》在日本出版于2012年6月，

接近青山七惠的最新创作，从写作经历上来说，在有《一个人的好天气》这种发乎于情、天然去雕琢的作品五年之后，距离成功发表处女作《窗灯》也已经七年，应该更为成熟和端庄才对，但实际上《紫罗兰》更像是一点随机的念头进而发展成一篇的短篇小说。现在数万字的容量已经超过了《紫罗兰》能含有的能量，长度拉伸太长，导致作家本人叙事上体力不支是肯定的。

我曾经以为这位日本八零后女作家有一种魔幻般的力量，以往对于无论是哀而

不伤的《一个人的好天气》，还是不咸不淡却能酝酿出极其震撼效果的短篇小说集《碎片》，的确都有一种被貌不惊人的刺痛感，那种缓慢的、富有韵律的小说语言几乎成了青山七惠的一种招牌武器。但这部《紫罗兰》不但无法承载老读者的一贯期待，甚至也不能将之看成一部合格的青春成长题材小说。就此，作家本人的倦意和怠慢之感并不难观察到，这是一个重复自己写法、节奏乃至内容的过分消耗的小说家。❶





陈平拿着当年印有通缉他的通缉令的报纸

最后一个共产主义者的离去

特约撰稿人 吴强 (qiangwu.de@gmail.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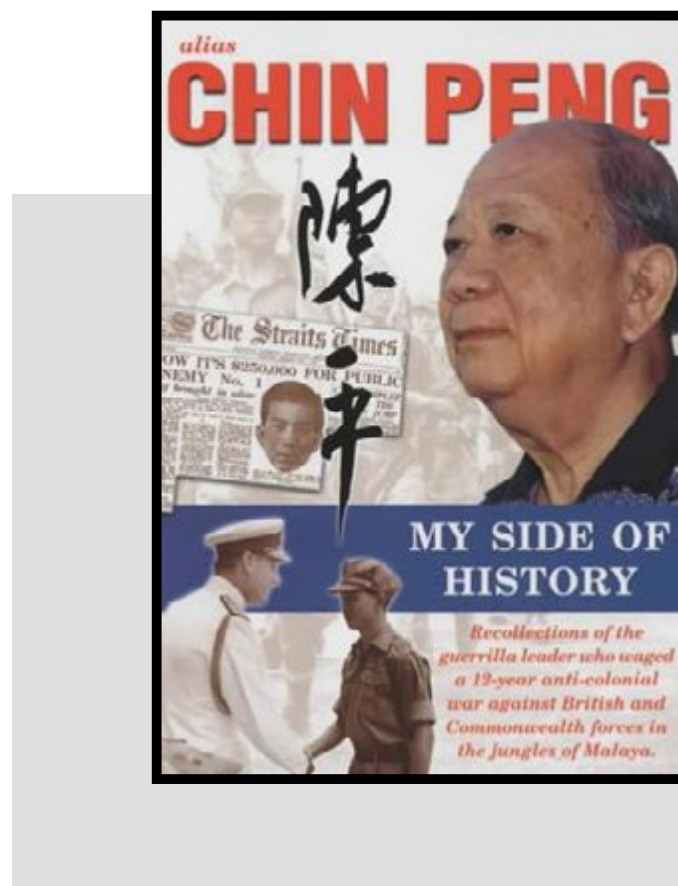
9月16日，陈平，原马来亚共产党总书记，在泰国首都曼谷去世。但就在他的去世之前，2013年5月的马来西亚选战中，人们又重新开始谈论马共和陈平。所以有理由相信，在他的身后，陈平、马共、中共、冷战等等，一段几乎被人淡忘的历史将重现公共视野，对人们重新反思东南亚甚至思考未来亚洲格局都会有相当帮助。

陈平，原名王文华，1924年10月21日生于马来亚霹雳州南部实兆远镇一个华人中产家庭。其父王声标，祖籍中国福建省福清。母亲关氏，是新加坡梧槽区华人大户关家之女。实兆远是华人聚居区。马来亚30年代由当地国民党支部和陈嘉庚等人组织领导的“爱国援华”运动影响了几乎所有大马华人，陈平的父亲便一直关心中国的抗战和政治发展。陈平的小学和中学时代接受了系统的中文教育，并在中学年代积极参与了马共外围组织“抗敌后援会”的活动，这些经历令他在此后很多年里，一直以中国作为其国家认同。

在成为后援会的核心成员之后，陈平逐渐接触到大量左派著作。根据陈平自己的回忆，阅读毛泽东的著作，促使他最终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1940年初，陈平成为马共党员。而马共则正式成立于1930年，由共产国际派出的胡志明，一手组织当地原有特别是“清党”后流落南洋的中共党员建立，马共其后的发展也一直以华人成员为主体。

在日据时期，陈平逐渐成为马共在霹雳州的领导人和游击队指挥员，并全程参与了与英军136部队的合作。战后，盟军及英国当局为表彰马共在战争中的合作和贡献，向陈平及马共其他几位军事领导人授予“缅甸星”勋章和“1939/45星”勋章。二战结束后，从1948年起马共与中共恢复联络，马共派出8位州级资深干部通过香港的管道去中国治病，并接受中共的理论和技术培训长达10年。

在1947年除掉党内叛徒、英国间谍、越南人的前任总书记莱特后，陈平成为马共新一



任总书记，并一直担任此职务直到1989年合艾和平协议达成之后的马共解散。1948年2月英国殖民当局强行推出实施“马来亚联合邦”和“1948年驱逐出境法令”后，马共得出了非暴力宪政斗争大门逐渐关闭、应准备重新开始武装革命推翻殖民统治的结论，陈平领导马共放弃了对殖民当局的妥协政策。1948年6月，大马进入紧急状态，马共走进丛林开始游击战，陈平从抗战英雄变为英国头号通缉犯，马共也被英国和马来当局视作一个反叛的华人政党。

考虑到中国当时发生的巨变以及巨变之后的最初几年红色中国承认双重国籍、和冷战的兴起与中南半岛局势戏剧性的变化，这一切都使得马来亚所有华人在政治上变得十分可疑。在“紧急状态”最初的几年里（截至1952），有大约15,000名华人因“涉共”被驱

逐出境。结果，华人商业精英在进行自身的政治组织时相当困难。而且，富裕的华人发现他们的利益常常跟那些马来官僚精英而非华人工人阶级更为一致。于是，主要的华人政党，马华公会(Malaysian Chinese Association, MCA)，联合了马来人的精英政党，巫统(United Malays' National Organization, UMNO)，为1952年争夺吉隆坡选举结成了联盟。这一安排得到了英国的加强，后者将族群合作视为最终独立的前提条件，也排除了吸收马共加入政治联盟的可能。

1955年，巫统与马华公会组成的政党联盟在大马议会选举中取得压倒性胜利。这一背景下，随后由陈平代表马共参加的著名“华玲谈判”因此更像一个历史插曲，或者说是冷战代理人与新兴民族独立运动的冲突。缘起是，1954年马共的通讯联络因“紧急状态”被切断数月，身处北京的马共领导人小章（章凌云）在与中共和苏共进行沟通之后，发表了一个声明，声明暗示马共已经做好准备，考虑以谈判的方式结束与殖民当局的冲突。当马共两位书记陈平和杨果获悉这份声明时，已然无从改变声明内容，于是开始准备回应当局可能的谈判要求。在马来亚议会大选中获胜的巫统领导人东姑阿都拉曼和马华公会会长陈祯禄，迅速抓住了这份声明带来的政治机会，邀请马共在吉达州华玲举行会谈。马共方面认为有机会与之达成和平协议，同时受到中国方面尽量达成协议的建议，派出了由陈平、陈田和拉昔迈丁组成的代表团，参加了华玲会谈。

马共在会谈中提出马共作为政党合法

化，结束紧急状态，拒绝投降和政治审查等要求，巫统方面没有接受这些要求。巫统方面只是将谈判视为与英国殖民政府进行讨价还价的筹码，对谈判的成功与否并不关注。东姑、陈祯禄和英方代表马绍尔坚持要求马共投降并接受政治审查，导致谈判失败。不过，难得珍贵的，马共并未因中国方面的意见而对谈判底线予以妥协，坚持要求废除大马公共政治中违背人权，违背言论自由的制度，并希望在政府特赦之后马共能成为合法的政治组织，表现了相当的独立性和通过和谈达到放弃武装斗争的决心。

在整个50年代直到60年代初，英军派出以廓尔克人为主的特种部队，并有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军队的协助，马来当局也辅以军警民兵甚至部落民参与围剿，在越战之前创造出了一个所谓成功“丛林战”的神话。面对英军和马来当局实施的“布里格斯计划”和“新村”围困，在狭窄的战略纵深内，马共游击队的活动空间被压缩分割在几个孤立的根据地内，生活困难，大部分人员、部队不是南撤到新加坡、印尼，就是北撤至泰国南部。在陈平动身去中国之前，马共高层已经取得了比较一致的意见：放弃武装斗争，回归大马社会，重拾政治斗争路线。

然而，在陈平到达北京并与中共方面会谈之后，中共方面力劝马共坚持武装斗争路线，并以东南亚各国共产主义运动形势大好为说辞，最终说服马共领导层改变了初衷，继续武装斗争路线。可以说，1961年陈平北上中国是马共的一个转折点。自此，出于越战升级

后“整个印支半岛和东南亚革命形势的变化”，马共开始正式接受中共的财政援助，试图扩大武装斗争，策应“越南人民的抗美斗争”。以陈平为首，马共高层中多数人远离斗争前线，政策决策也日益脱离大马社会的现实发展，而与中共的地缘政治保持协调。马共游击队在泰南艰难支持了20余年，其人员、装备和物资，几乎全赖中国方面的支持。马共最有效的宣传手段“马来亚革命之声”广播电台，也设在中国的长沙附近，直至八十年代初期中国对外政策上发生了剧烈转向，经中共方面要求和协商后关闭。

在1960年代末冷战的高潮期间，马共困在泰南，陈平客居北京和长沙，基本无所作为，不过并不妨碍陈平和马共继续陷入悲剧性的角色。1969年马来西亚大选结束后发生“5·13”种族冲突事件，由时任副首相及内政部长的敦拉萨兼任的“全国行动理事会”出台了一份“5·13悲剧”的报告书，将“5·13事件”归咎于马共及少数华人私会党的策动与种族挑唆。彼时，党的领袖陈平在内的马共领导层大部分逗留在中国，马共内部则因为受到中国当时的文化大革命的影响，疲于路线斗争和政治辩论，而日后被视为马共宣传喉舌的“马来亚革命之声”则是在1969年11月才开始启用。事后的英国解密档案也显示，马共与“5·13事件”的联系几近于无。但这一切，都不妨碍大马当局将马共描述成族群冲突的罪魁祸首，借机中断最初由英国人帮助起草的民主宪法、强化马华之分、维持族群间的不平等状况、实行以内部殖民主义为基础的威权统治。

1989年，随着冷战形势趋于缓和，以及中国方面东南亚政策的变化，中共最终停止了1982年以来逐年减少的援助。这一年，由泰国军方出面，马共与马来西亚政府坐到了谈判桌前，在泰国南部旅游胜地宋卡府合艾市的蠡园酒店开始和平谈判。陈平在最后一轮谈判前离开中国，亲自参与最后的谈判。在答应解散马共和游击队，以换取政治上的相应权利后，马共与马来西亚政府和泰国军方达成了由三方签署并执行的“合艾和平协议”。此后，陈平一直居住在泰国，马来西亚政府未能完全履行“合艾和平协议”的精神，导致陈平至今无法返回马来西亚定居。

今天看来，马共的失败证明了冷战中一个棋子的命运，也证明了缺乏足够战略纵深下丛林游击战的局限，在这一点上全球各地的经验大同小异，东帝汶的乡村游击战面对印尼军



队的战略村分隔和特种作战同样难以为继，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被证明是一个错误的革命输出战略。不过，陈平的个人命运，无论他身前还是身后，可能更有意义：只要威权体制继续存在，它就将不断扩大再生产自己的敌人——无论政敌还是“危险分子”或者普通人民，而人民最终会认识到威权的性质，并且找到从威权内部和外部进行有效抗争的手段，而不是转进丛林这样的自我隔离。

2004年10月，陈平的回忆录《我方的历史》在新加坡出版。2006年，一位有马来人导演的陈平的传记电影《最后一个共产主义者》出现在当年的英国、加拿大甚至新加坡的电影节上，但是至今仍未在马来西亚公映。🔴





读 肯特(美国)



獨立閱讀

China Individual Reading Report

鸣谢：季风书讯

合作媒体：

搜狐读书
book.sohu.com

搜狐新闻
news.sohu.com

文景

博客
网易

blog.163.com
新锐人文生活

多看阅读



文章版权作者所有，欢迎订阅，转载请注明出处和订阅信箱：shrbooks@gmail.com
文章和图片如果涉及版权，敬请来信告知。
独立阅读讨论区：<http://www.douban.com/group/duliyuedu/>